

乾隆皇帝對孝聖皇太后的孝行和 它所顯示的意義

陳葆真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乾隆皇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和他的生母孝聖皇太后（1692-1777）一生相處六十六年，兩人之間的互動以乾隆元年（1736）他登基為界線，分為前後兩個階段：1、前期為他身為皇子（1711-1735）時期的二十五年。在這時期中，母子兩人互動的資料幾乎空白。2、後期為他登基（1736）之後到孝聖皇太后逝世（乾隆四十二年，1777）為止的四十二年（1736-1777）。在這期間他對她的孝養無微不至。以下個人謹將兩人在這兩個時期中的互動情形，與相關的文獻和圖像資料，加以整理；並以七個議題呈現：1、雍邸時期；2、皇家生活；3、外出巡狩；4、南巡盛況；5、大壽慶典；6、徽號尊銜；7、家事國事。個人期望經由對這些資料的觀察和詮釋，可以了解乾隆皇帝對孝聖皇太后在這兩個不同時期中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孝行，以及他的這些孝行所顯示的意義。

關鍵詞：清高宗、乾隆皇帝、崇慶皇太后、孝聖皇太后、孝聖憲皇后革

前 言

乾隆皇帝（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1736-1795 在位，圖 1）是雍正皇帝（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1678 生，1722-1735 在位）的第四個皇子。他的生母鈕祜祿氏（1692-1777）為滿洲鑲黃旗四品典儀凌柱的女兒。有關他的親生父母之謎，野史頗多臆傳，比如說他是漢官浙江海寧人陳世倌（1689-1758）之子；或說他的母親是漢女子等等。關於這些傳說，學者已辯其不可信；¹ 本文採用正史之說。² 鈕祜祿氏幼時家貧，居熱河；康熙四十三年（1704），當她十三歲時入京，被選入皇四子胤禛（當時封多羅貝勒）的府中為格格。她當時的身分並不高，直到她二十歲（康熙五十年，1711）生下弘曆後，地位才日漸升級。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她被封為熹妃，之後晉為貴妃。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1735），母以子貴，她被尊為「崇慶皇太后」（圖 2）。乾隆四十二年（1777），她逝世後被尊諡為「孝聖皇太后」；期間累加各種尊號（詳後論）。又、由於她是雍正皇帝（廟號：世宗憲皇帝）的皇后之一，因此史書都稱她為孝聖憲皇后。³ 為論述方便，以下本文統一稱她為「孝聖皇太后」，或簡稱為「太后」。由於乾隆皇帝對她的孝養無微不至，因此她的一生榮華尊貴，為史上僅見。本文將探究乾隆皇帝對她的諸多孝行和它所顯示的意義。

乾隆皇帝和他的生母孝聖皇太后一生相處六十六年，兩人之間的互動以乾隆元年（1736）他的登基為界線，分為前、後兩個階段：1、早期為他登基（乾隆元年，1736）前，身為皇子（1711-1735）的二十五年。在這時期中，兩人互動的資料幾乎空白。2、後期為他登基（1736）之後到乾隆四十二年孝聖皇太后逝世（乾隆四十二年，1777）為止；在這期間他對她的孝養無微不至。以下個人謹將兩人在這兩個時期中的互動情形，與相關的文獻和圖像資料，加以整理；並以以下的七個議題呈現：1、雍邸時期；2、皇家生活；3、外出巡狩；4、南巡盛況；5、大壽慶典；6、徽號尊銜；和 7、家事國事。個人經由對這些資料的觀察和詮釋，可以了

-
- 1 參見周遠廉，《正說乾隆》（臺北：大地出版社，2006），頁 7-13；翟文明，《乾隆圖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頁 11-19。
 - 2 乾隆皇帝本傳，見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1977），冊 2，卷 10-15，頁 343-565；（清）唐邦志輯，《清皇室四譜》，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資料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 1，〈列帝〉，頁 8b-9b；雍正皇帝本傳，見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冊 3，卷 9，頁 307-341。
 - 3 關於孝聖憲皇后傳，見：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1923 自序），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輯 75，冊 742），傳上，頁 107a-116a；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 2，后妃，頁 17a-18a；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卷 214，頁 8914-8915。

解乾隆皇帝對皇太后在這兩個不同時期中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孝行，以及他的這些孝行所顯示的意義。

一、雍邸時期

乾隆皇帝的生母（孝聖皇太后）鈕祜祿氏為滿洲鑲黃旗人，生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父親凌柱為四品典儀內大臣，處於中階官員，家中不算顯赫。康熙四十三年（1704），鈕祜祿氏十三歲時，被選入皇四子胤禛（當時封多羅貝勒）的府中為格格。當時她的地位並不高，等同於貼身侍女。康熙五十年（1711），當她二十歲時，生下了胤禛的第四個兒子弘曆（乾隆皇帝）。⁴她是否因此而得以正式晉身為側福晉，不得而知。至於雍邸時期的這對母子是否有畫像存世？這是令人十分好奇的問題。在現今傳世的〈胤禛讀書圖〉（圖3）中，我們可以看到年輕的胤禛，穿著漢服，在書齋中讀書；屋外另有四女陪侍。羅慧琪指認其中的一個女子，可能便是年輕時候的鈕祜祿氏。⁵但是，關於這一點，目前學界尚未有一致的看法。另外，在〈胤禛賞花圖〉（圖4）中，所見的是胤禛和一個身分特別的孩童，以及許多從員，在圓明園的牡丹臺（鏤月開雲）欣賞牡丹盛開的情形。這個身分特別的孩童，沒有問題，應是胤禛的兒子之一。羅慧琪也認為他是弘曆的兒時模樣；而此圖是紀念當年弘曆在牡丹臺第一次見到康熙皇帝（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1654生，1662-1722在位）的往事。⁶關於這點，個人的看法較有保留。理由是：因畫中胤禛相貌仍相當年輕，約似三十多歲，當時弘曆可能尚未出生，或仍在幼年；而畫中的孩童看起來年約七、八歲，依此判斷他不可能是弘曆，而較可能是弘曆的二哥弘昀（1700-1710）或三哥弘時（1704-1721）。又、弘曆第一次見到康熙皇帝時，已經十二歲了，應比畫中孩童要成熟一些。基於這些理由，個人認為畫中的孩童應非弘曆。⁷

按圓明園原為明代官員的私家花園，康熙四十八年（1709）時才賜給雍親王胤

4 見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上，頁107a-108a；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2，頁17a-18a。

5 見 Hui-Chi Lo, "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Religious Transcendence: The Yongzheng Emperor's (1678-1735) Deployment of Portraiture,"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9), 32-40.

6 Hui-Chi Lo, "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Religious Transcendence: The Yongzheng Emperor's (1678-1735) Deployment of Portraiture," 57-58。

7 參見陳葆真，〈雍正與乾隆二帝漢裝行樂圖的虛實與意涵〉，《故宮學術季刊》，27卷3期（2010春），頁53-54。

禎。在那之後，胤禎便加以擴建，直到他即位之後，在雍正四年（1726），才正式遷入，作為他平日的園居。⁸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雍親王邀請康熙皇帝到圓明園的牡丹臺賞花，並安排年值十二歲的弘曆謁見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第一次見到弘曆，言談之下，十分歡喜，便命後者隨他進宮居住，並賜住暢春園的澹寧居；⁹ 夏日又攜往避暑山莊，令居萬壑松風，且同赴木蘭秋獮。同時康熙皇帝又曾攜弘曆一同到山莊外的獅子園，探望當時隨駕的雍親王和他的家眷。當弘曆的生母鈕祜祿氏奉命來見時，康熙皇帝便連說她是「有福之人」。¹⁰

二、皇家生活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皇帝逝世，享年六十九歲；雍親王胤禎即位，年號雍正（1723-1735）。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便備好密詔，立皇四子弘曆為嗣君。¹¹ 同年十二月，封鈕祜祿氏為熹妃（時年三十二），後晉為貴妃。¹² 當時雍正皇帝住在養心殿，而皇四子弘曆則奉命住在乾清宮東側的毓慶宮，隱有東宮太子之意。雍正四年（1726），圓明園二十八景建成，雍正皇帝和眷屬遷入居住。當時弘曆奉命住在園內西側的長春仙館；¹³ 雍正十年（1732），他的父皇便因此而賜他「長春居士」之號。¹⁴ 由於這些淵源，弘曆對「長春」二字特別偏愛，因此後來在他即位之後，便常喜歡以「長春」做為他在各處的書齋名；這樣的地方至少有五處以上。¹⁵ 雍正五年（1727），弘曆十七歲，奉命與富察氏（孝賢皇后，1712-1748）成

8 關於圓明園，參見汪榮祖，《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孟亞男，《中國園林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257-279。

9 （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5，頁633），卷25，頁7。

10 見（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1，頁361），卷91，頁6-7，〈甲寅遊獅子園〉注；又，參見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上，頁107b。

11 見《清實錄·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頁12a-b；圖版參見馮明珠編，《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34、41、154。

12 同註3。

13 （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5，頁484），卷14，頁15，〈題含碧堂〉注。

14 見（清）慶桂，《國朝宮史續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卷1，頁7-8，〈訓諭〉，「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條。

15 （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6，頁280），卷61，頁27，〈長春書屋〉詩注。

婚（圖 5），¹⁶ 同時遷到紫禁城西北區的建福宮居住。¹⁷ 皇子時期的他，先後又娶了九個側福晉。十分明顯的，這是歷代皇室的策略，那便是盡量繁衍宗室，以固皇權。雍正十一年（1733），皇四子弘曆被封為寶親王，那年他二十三歲。¹⁸

在這期間雍正皇帝也用心訓練弘曆日後成為一個幹練的君主，因此時常派他代理政務和到祖陵祭祀。比如，雍正十三年（1735），弘曆奉命入值辦理苗疆處，¹⁹ 和到東陵（在河北遵化縣）祭拜順治帝（1638-1661）和康熙帝的陵墓。有一次當弘曆奉命去東陵祭拜後，回程中路過薊縣的田盤山（盤山），對那裡山勢優美、林木蔥鬱的氣象極具好感。²⁰ 因此，後來他登基之後，從乾隆七年（1742）開始，便陸續在盤山營建靜寄山莊，且有許多關於盤山和靜寄山莊的詩篇和畫作。²¹ 而且，他每次到東陵祭拜順治和康熙二帝陵後，必到靜寄山莊。²²

雍正八年（1730）之間，弘曆結集了他在這之前的七年中（1723-1730）於課堂上所作的序論、畫記、雜文、詩、賦等共十四卷，名為《樂善堂文鈔》。「樂善堂」之名來自他出生處的雍親王邸，東路建築群中的一個堂名，因康熙皇帝的賜書而得名。²³ 《樂善堂文鈔》前有他的師長和宗親，包括張廷玉（1672-1755）、福彭（1708-1748）、福敏（1673-1756）、朱軾（1665-1736）、蔡廷錫（1669-1732）、邵基（康熙六十年進士）、蔡世遠（1681-1734）、鄂爾泰（1677-1745）、允祿（1695-1767）、允禮（1697-1738）、允禧（1711-1758）、和弘晝（1711-1770）等十人在雍正九年到十一年（1731-1733）間所寫的序。此文鈔後來在乾隆二年（1737），經過他再增補從雍正八年到乾隆二年（1730-1737）之間所作的各種文章，集成三十卷，並第一次正式刊行；後來又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再修訂刊行，並定名為現今所見的《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²⁴ 在此集中所錄的各種詩文反映了乾隆皇帝早年

16 孝賢皇后小傳，見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下，頁 2a-14b。

17 （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9，頁 553），卷 19，頁 9。

18 同註 2。

19 見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 1，頁 8b。

20 見（清）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0，頁 505），卷 26，頁 14，〈盤山〉詩。

21 如見（清）清高宗，《御製文初集》（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2，頁 416），卷 26，頁 1，〈偶憶盤山別業命筆寫之，並題以句〉。他又曾命允禧作《盤山山色圖》，而後在其畫上題詩，見同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2），卷 24，頁 22；卷 26，頁 2-6。

22 例見（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6，頁 262），卷 60，頁 24。

23 陳觀濤，《話說雍和宮》（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頁 26。

24 見（清）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0，頁 234-256），頁 1-39，〈上諭〉、〈奏議〉、〈序〉。

所受漢文化教育程度的精深和廣博。他的授業教師都是碩儒；在他們的指導之下，加上他自己聰穎的天分，和敏銳的思辨能力，造就了他這時期的詩文成就。概略的說，他這時期所作的文章，不論在結構方面，或詞藻方面，以及論辯和見解方面都見功力。他的文章議題多元，主要在為政、論史、和修身等方面。這是皇子教育的核心議題。至於他的詩篇，因為限於人生閱歷，所以在題材方面，多是他生活周遭的人事和風景；而在感情的深度上也較為一般，較少令人震撼的深刻作品；不過，在用字遣詞方面較為用心，較少有類似後來的湊句之作。這些作品固然反映了此期中他在文史方面的知識和功力，但同時也可看作是他的師傅們對他督導的成果。他對自己這些早期的作品相當自豪，而且明確保證它們都是他自己所作，絕無後來時有別人代筆的情形。他在序中說：「蓋是集乃朕夙昔稽古典學所心（衍）得，實不忍棄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贗各半……」²⁵

就主題而言，他這時期所作的一些酬贈詩篇中，常見有關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的作品。可見這二人是他心中的典範。又由許多作品中可知他在這時期的生活中比較親近的人物，除了他的老師蔡世遠（聞之、二希等人）之外，還有他的二十一叔允禧、二十四叔允祕（1716-1773）和他的五弟弘晝等人。或許他想藉此表現他是一個尊師重道、尊敬長輩、和友愛兄弟的人。其中他對能書擅畫的允禧充滿仰慕，曾贈後者詩作多篇。如他在〈題二十一叔父山靜日長小景〉中說：「……嗟我學畫法，年來曾探討……」。²⁶ 此詩作於甲寅（1734）元日，由詩句中可知此時他自己會作畫，而且也曾和允禧論畫。又、他在〈夏日寄二十一叔索詩畫〉中，有句：「瓊瑤乞並縑緗惠，景仰還期步後塵」。²⁷ 其中明言他景仰允禧的畫藝並希望自己也和後者畫得一樣好。由此可知，弘曆年輕的時候，對詩文藝術充滿興趣，十分投入，游心於藝，且曾期望自己在書畫上更上層樓，達到允禧一般的成就。

但事實果真如字面上所顯示的這麼單純嗎？個人以為不盡然。在它的背後可能同時具有一種較複雜的政治宣示。它應該也是一種避嫌的行為，一種表態，表示他對於權力和大位沒有任何貪慾的心思。為何如此？個人認為，那時雍正皇帝雖已即位八年，地位穩如泰山；但是，康熙皇帝晚年他和親兄弟之間彼此爭奪皇位繼承的

25 (清)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0,頁234),頁2。

26 (清)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0,頁443),卷19,頁12-13;圖見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51,邱士華說明。

27 (清)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0,頁526),卷29,頁4。

殘酷鬥爭，所造成的前車之鑑和陰影，應仍是他最擔心會重複上演的事，也是他最不願見到會發生在他自己諸皇子身上的事。雖然他在雍正元年已密立弘曆為儲君，但當時並未公開宣佈。何況此時他才即位八年，而且春秋正盛，豈可不加防範自己千辛萬苦爭奪而得的皇權？哪怕是自己的皇子，他也得防範他們的覬覦生心。而弘曆在這時結集了《樂善堂文鈔》，既展示了自己的淵博學問、精闢見解、和高明的能力，一方面可安他父皇的心，因為後繼有人；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必須隨時表現他自己對皇位沒有野心。這樣，既可以讓雍正皇帝放心，同時也可以平息其他皇子的忌妒和不安。所以他藉詩文來宣示他的立場，應是為了避嫌的一種自我防衛之舉，也是一種防微慮遠的明智之舉。當然，這種行為可能也是有高人指點。無論如何，後來他雖然身為帝王，擔當社稷重任，但仍時時不忘吟詩作畫的興趣，實在都是這時所奠下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他所作的詩文之中，幾乎沒有任何有關兒女私情的作品。就是為女性長輩而作的詩也十分有限；而且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找不到任何一件詩文是專為他的生母而作的。雖然集中有一首題為〈恭祝皇母聖壽〉；²⁸但是，他在此處所說的「皇母」，應是指當時的孝敬皇后（約 1678-1731）（圖 6）而言。按當時所有的皇子都需稱皇后為「皇母」；如果是庶出，則稱自己的生母為「聖母」，以示尊卑之別。因此，這首詩應是專為當時的孝敬皇后所作的祝壽之詩；而非是為他的生母熹妃（熹貴妃）而作的。甚至在全集之中，也沒發現他有任何作品是贈送給他家庭中與他最親近的女性（如他的妻妾）。雖然這可能也是他當時故意顯示他不是一個呢於兒女私情的人；但是，在他這時期的作品中竟然沒有任何一件詩文是贈送或提及他的生母熹妃的作品，則又有些令人難以理解。這樣的行徑與他在登基之後的行為完全相反。因為在他即位後所作的四萬多首御製詩中，有多達四百多首以上的詩都與他的生母有關。其中也反映出他在日常生活中，幾乎無時無刻不想到他的生母。

既如此，那麼他在此時所表現的這種沉默與似乎刻意迴避的態度，又是為了什麼原因呢？依個人的理解，此期中他之所以不提到他的生母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他是庶出，而當時皇后還在，因此他不得不有所顧忌；也因此，他對自己親生母親的感情也就不敢太過張揚所致吧。不過，到了雍正九年（1731），當孝敬皇后過世，

28 (清)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0，頁 480-481），卷 24，頁 3-4。又、孝敬憲皇后傳，見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上，頁 104a-106b；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卷 214，頁 8913-8914；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 2，頁 16b-17a。

和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在他登基之後，這種情形就完全改觀了。在那以後的四十二年當中，他時刻表現出他對自己的生母親切而濃厚的感情和孝心。首先，在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他尊生母鈕祜祿氏（熹貴妃）為崇慶皇太后。在那之後，他盡心盡力奉養太后四十二年：平日時常省親問安；出外巡狩，也都奉太后同行；賀壽禮，上尊號，更無時間斷；處處顯示出他是個難得的孝子仁君。

乾隆皇帝侍母至孝，奉養太后無微不至。這一點可以從他在位六十年中所作四萬多首詩中約有四百多首（佔總數約百分之一）的詩都與太后相關的事實中看出來。²⁹他在日常生活中，對太后在茲念茲，無時不在心上。簡言之，他每凡居處、出入、與巡狩，多奉母同行。母子二人與扈從除巡狩外，都隨季節變化，在每年不同的時間，居住在不同的地區，從事不同的活動。約略而言，二人固定的住處有三：一為紫禁城（太后住慈寧宮，皇帝住養心殿）；二為郊外園居（太后住暢春園，皇帝住圓明園）；三為避暑山莊（太后住松鶴齋，皇帝住煙波致爽殿）。他們每年隨季節而一同遷移。大致上，從每年冬至之前，到隔年新春的隆冬期間，他們都住在紫禁城內；一則，住在那裡比較溫暖；二則，為了皇帝方便於從事各項重要的祭祀活動。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特別重修太后所住的慈寧宮，到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全部完工，費銀五千四百七十八（5,478）兩有餘。³⁰在宮中期間，乾隆皇帝多間隔數日必親自到太后住處問安。他們在宮中過除夕和新年。通常他們在除夕夜在保和殿宴一二品武臣；新年初三日，皇帝在紫光閣宴外藩；³¹正月四、五左右便一同移駕到圓明園準備過元宵燈節。節前一日皇帝宴近支宗室及子孫輩；³²上元節在正大光明殿宴一品文武大臣，³³燈節前後五日通常在「山高水長」看煙

29 按乾隆皇帝即位後，每十二年所作之詩，各輯為一集。依個人粗略統計，在太后逝世（乾隆四十二年，1777）之前所見他的《御製詩》初集～四集中所收詩篇約有 37,850 首，而其中有關太后之作至少有 409 首。其數大約如下：《初集》（4150 首）中有 69 首；《二集》（8000 首）中有 80 首；《三集》（16,000 首）中有 173 首；《四集》（9700 首）中有 87 首。總計四輯共收 37,850 首御製詩，而其中有關太后的詩有 409 首，佔全數的 0.0108。

30 章唐容輯，《清宮述聞》（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 6，頁 19b-21a。

31（清）昭槤，《嘯亭續錄》，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輯 7，冊 63），卷 1，頁 6a，〈宴外藩〉條。

32（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9，頁 578-579），卷 20，頁 15-16，〈上元前日宴近之宗室及子孫輩有感而作〉。

33（清）昭槤，《嘯亭續錄》，卷 1，頁 6a，〈宴外藩〉條。

火。³⁴節前一日，或燕九（十九）日小宴廷臣；³⁵通常在節後，太后便回暢春園，皇帝則留居圓明園，一直住到夏天五月。他們通常會在端午節時一同在圓明園的福海看龍舟競渡。³⁶過了端午節後，他們才前往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³⁷在留京的這段期間皇帝除了處理政務、每月逢五在乾清宮御門聽政外，還必須親自主持各項重要的例行祭典。

這些重要的祭典包括大祀、中祀、廟、壇之祭。³⁸從年底開始進行，如：1. 冬至到天壇祭天；³⁹十二月二十三日，坤寧宮祭竈神⁴⁰2. 正月，到雍和宮瞻禮；⁴¹上辛日，到天壇祈穀；⁴²戊日，祭社稷壇。3. 二月（仲春），在先農壇行耕藉禮；丁日祭孔並親臨經筵；⁴³朔日，在坤寧宮祭月神。⁴⁴4. 三月，清明節時，往東陵或西陵謁祖陵。5. 四月（孟夏），癸日，在天壇行常雩禮。⁴⁵6. 六月（夏至），祭北郊澤壇等等。也就是說，在這段期間乾隆皇帝雖然住在圓明園中，但每逢上述例行公事之前，他必須親自從圓明園返回宮中執行。⁴⁶但不論他住在何處，他總是殷勤地每隔數日就往暢春園向太后問安。

34 (清) 昭槤，《嘯亭續錄》，卷 1，頁 5a-b，〈山高水長看煙火〉條。

35 (清)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卷 94，頁 16-17，〈燕九日小宴廷臣作〉注。

36 (清) 昭槤，《嘯亭續錄》，卷 1，頁 10a-b，〈端午龍舟〉條。

37 (清) 昭槤，《嘯亭續錄》，卷 2，頁 6a-9a，〈木蘭行圍制度〉條。又、關於乾隆皇帝《木蘭秋獮圖》，參見畢梅雪 (Michele Pirazzoli)、侯錦郎合著，《木蘭——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38 參見 (清)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10，頁 347)，卷 45，頁 32-33。

39 (清)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11，頁 386-387)，卷 92，頁 27-28，〈冬至南郊禮成述事〉。

40 (清)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11，頁 516)，卷 100，頁 39，〈坤寧宮祀竈日作〉。

41 (清)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11，頁 392-393)，卷 93，頁 5-6，〈新正雍和宮瞻禮示諸皇子〉。

42 (清)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11，頁 394)，卷 93，頁 8-9，〈乙卯上辛〉注。

43 (清)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10，頁 476)，卷 53，頁 10-11，〈仲春丁祭至聖先師禮成述事〉；另外一詩又見 (清)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11，頁 425-426)，卷 5，頁 1-3。

44 (清)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10，頁 423)，卷 94，頁 22-2，〈二月朔日作〉注。

45 (清)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11，頁 338-339)，卷 89，頁 18-19，〈祈雨六韻〉。

46 以上有關乾隆皇帝與太后一年中的生活概況，皆見於他的詩注中，參見 (清) 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5，頁 770)，卷 34，頁 18；(清) 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6，頁 264) 卷 60，頁 28。

就是每年北狩赴避暑山莊，或到木蘭圍場秋獮，乾隆皇帝也都奉太后同行。按乾隆皇帝第一次率眷屬、宗室、官員、和隨從等赴木蘭秋獮，開始於乾隆六年（1741），以後幾乎每年都持續為之（圖 11）。據莊吉發教授的統計，乾隆皇帝從乾隆六年到六十年（1741-1795）的五十五年間，曾赴避暑山莊共有四十九次。⁴⁷ 他的北狩起初是在七月立秋之後才從北京出發；路上行止所需的十多天。後來為了避開那時段中常發生的暑熱多雨而導致路上泥濘難行，所以改成一過了端午之後，母子兩人便與眷屬、宗室、官員、扈從等大隊人馬，一同出發前往避暑山莊。⁴⁸ 他們通常在山莊慶祝乾隆皇帝的生日（八月十三日）和過中秋節。節後，乾隆皇帝一行人便奉太后一同往木蘭秋獮。⁴⁹ 每次秋獮為期大約二十天，然後再回到山莊。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太后八十多歲之後，因年紀太大，恐體力不支，才未隨行。但也因此，乾隆皇帝便將秋獮時間縮短成為十八天。⁵⁰ 重陽節時，他們在山莊的山區登高。過了重陽節，天氣漸冷，乾隆皇帝才奉太后返回暢春園，而自己則回宮處理政務。一直到十一月冬至之前，他才迎太后返回慈寧宮，以準備慶賀她在冬至過後的生日（十一月二十五日）。而他則必需在冬至當日到天壇祭天，和除夕當日在宮中的奉先殿祭祖。

以上所述為乾隆皇帝與太后每年例行活動的大概情形。雖然他們在上述三地居處的遷移日期，常會因各種理由而小有變動，但大致上皆依以上的活動模式。⁵¹ 這種方式基本上保存了游牧民族隨季節變動而遷徙的生活習慣。不論居處在何地，乾隆皇帝都經常往太后處問安，且時常贈送她各種珍貴的物品，其中包括他的御筆書畫作品。⁵²

47 莊吉發，《清史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冊 1，頁 240-242。

48（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7，頁 349），卷 6，頁 31，〈六月朔日至避暑山莊即事成什〉注。

49 例見（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5，頁 383），卷 7，頁 19，〈八月十八日恭奉皇太后木蘭行圍啟蹕之作〉；（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6，頁 386）卷 68，頁 20，〈中秋即事〉注。

50（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6，頁 257、259），卷 60，頁 14，〈熱河啟蹕木蘭行圍之作〉，和頁 18，〈出崖口〉二詩之注文。

51 以上有關於乾隆皇帝的各種年中行事情形，為個人從他所作眾多的御製詩及注文中輯得。

52 相關的許多例子，參見（清）清高宗《御製詩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2，頁 103-104），卷 1，頁 2-4，題所繪各科花卉詩，裝潢成冊進贈太后之事；卷 2，頁 6，〈乙未夏六月恭進皇太后字扇一柄謹成五律〉；《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5，頁 746），卷 33，頁 1，〈書扇恭進皇太后〉；卷 42，頁 5，〈瓶貯桂枝荷朵恭進皇太后並為圖以記其事〉；《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6，頁 882）卷 98，頁 3，〈恭奉皇太后觀荷即景得句〉。

三、外出巡狩

如上所述，乾隆皇帝幾乎每年夏秋雨季都在避暑山莊度過。簡計：他在位六十年中便曾到避暑山莊四十九次左右；此外，他又曾外出巡狩至少二十三次。簡言之，他在位六十年期間，曾經離京到各地巡狩共計至少有七十二次之多；平均每年出外遠行 1.2 次。這麼頻繁的巡狩活動，較康熙皇帝有過之而無不及。按康熙皇帝八歲登基，六十九歲逝世，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期中他離開紫禁城出外巡狩的次數至少六十五次，包括：赴熱河秋獮四十八次（康熙十六年至六十一年，1677-1722）⁵³ 和到各地巡狩至少十七次；⁵⁴ 平均每年遠行達 1.04 次以上。這其中還不包括他去東陵謁順治皇帝（清世祖；1635 生；1644-1661 在位）陵，和在近畿各地的視察活動。康熙皇帝的雄圖壯志、精力旺盛，可謂中國歷代皇帝之中少見者。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皇帝到外地巡狩的二十三次之中，有十四次都奉太后同行。他的重要巡狩包括：

1. 東巡山東（曲阜、泰山）六次，分別發生在乾隆十三年、二十一年、三十六年、四十一年、四十九年、和五十五年（1748、1756、1771、1776、1784、1790）；其中的第一、五、六等三次都奉太后同行。⁵⁵ 這還不包括另外三次，是他在南巡途中，順道赴泰山祭拜的次數（乾隆十六、二十二、二十七；1751、1757、1763）。

2. 西巡河南嵩洛一次：發生在乾隆十五年（1750）；那次也奉太后同行。

3. 幸山西五臺山六次：分別發生在乾隆十一年、十五年、二十六年、四十六年、五十一年、和五十七年（1746、1750、1761、1781、1786、1792）；其中前三次都奉太后同行。

4. 南巡江浙地區六次：分別發生在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1751、1757、1762、1765、1780、1784）；其中前四

53 莊吉發，《清史論集》，冊 1，頁 236-238。

54 這些巡狩包括：東巡曲阜一次（康熙二十三年，1684），西巡太原和西安一次（康熙四十二年，1703），出塞四次（康熙三十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四十年；1691、1696、1697、1701；前三次為御駕親征噶爾丹），幸五臺山五次（康熙二十二年、三十年、四十一年、四十九年、五十七年；1683、1691、1702、1710、1718），以及南巡江、浙地區六次（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1684、1689、1699、1703、1705、1707）。參見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 1，頁 6b-9b。

55 此據見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 1，〈列帝〉，頁 9a 所載。

次都奉太后同行。⁵⁶

5. 赴瀋陽盛京謁陵四次：分別發生在乾隆八年、十九年、四十三年、和四十八年（1743、1754、1778、1783）；⁵⁷ 其中太后參與前二次。

換言之，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太后逝世之前，乾隆皇帝不論到哪裡巡狩，幾乎每次都奉太后同行。而事實上，以上這些巡狩的日期，有些是特別為了配合太后的大壽而舉行的祈福或祝壽的活動。這樣的安排早已發生在他即位以後第一次出外巡狩的事，那便是：乾隆六年（1741），乾隆皇帝即位之後第一次奉太后到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乾隆皇帝每年在夏秋時節到避暑山莊居住，和到木蘭圍場秋獮，是依康熙皇帝以來的祖制。按康熙皇帝幾乎年年到木蘭秋獮。據莊吉發教授的統計，康熙皇帝在位期間曾經北狩熱河和到木蘭秋獮共約四十八次。⁵⁸ 這個活動的目的有二：一方面為遵守祖宗家法，訓練部屬騎射狩獵，具有軍事訓練的用意。另一方面為趁此與蒙古各部王公臺吉聚會，敦睦情誼，具有政治和外交效應。⁵⁹

簡言之，木蘭秋獮兼具了軍事、政治、和外交作用。但，乾隆皇帝之所以特別選擇在乾隆六年（1741）第一次到木蘭秋獮的原因，實是因為那年正值太后五十大壽，因此他特別趁此機會奉太后出遠門，飽覽山川之美和塞外風光，藉此為他母親慶祝五十大壽。而到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所動員的人員、車馬、各種器用和行伍，場面浩大，如〈木蘭圖〉（圖7，今藏法國遠東圖書館）中所見。⁶⁰ 更特別的是，他奉太后外出巡狩的活動，有時兼具了國事和家慶的兩重目的。比如：乾隆十五年（1750），正是他自己的四十正壽。他先在那年二月奉太后赴五臺山巡禮；八月十三日，又奉母命，立嫺妃烏拉納喇氏為繼后；九月又赴嵩山和洛陽。而在這兩次巡狩外再加上秋天時到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總計他那年共有三次遠行活動。

56 以上各巡狩資料參見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1，〈列帝〉，清高宗本紀，頁9a-b；和卷2〈后妃〉，孝聖憲皇后傳，頁17a-18a。但在高宗本紀中卻謂高宗「幸五臺者五」，乃為誤計，實應為「六」次。此誤乃因漏列乾隆十五年二月奉太后幸五臺之事。又、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卷214，頁8914，〈孝聖憲皇后傳〉，其中謂太后參與「南巡者三」，實應為「四」次。這兩處之勘誤俱可參見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孝聖憲皇后傳〉，頁17a-18a。

57 見（清）清高宗，《御製詩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2，頁311-312），卷18，頁2-4有關其恭謁永陵、福陵、昭陵諸詩；又其《御製詩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4，頁106-107），卷52，頁27-29；《御製詩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8，頁211），卷53，頁12-13；卷99，頁16-22，等處。

58 莊吉發，《清史論集》，冊1，頁236-238。

59 見（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0，頁693），卷68，頁15，〈山莊啟蹕行圍木蘭之作〉注。

60 畢梅雪、侯錦郎合著，《木蘭圖——與乾隆皇帝秋季大獵之研究》。

同樣的行為也發生在他的南巡活動中：乾隆十六年（1751），他第一次奉太后南巡江、浙地區；而那年正值太后六十大壽。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再度奉太后南巡歸來後，可能因為太被江南美景吸引了，因此又計畫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當太后七十大壽時，再舉行第三次南巡。但後來因碰到江蘇北部水澇嚴重，所以他便將原計劃延後一年，改在二十七年（1762）才舉行第三次南巡。⁶¹不過，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太后六十大壽的當年，他仍然特地奉太后到五臺山祈福。乾隆三十六年（1771），太后八十歲大壽時，乾隆皇帝也特別奉她到泰山祭拜祈禱。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當太后八十五歲時，他又再度奉太后到泰山祭拜。當他看到八十五歲的太后仍然能夠健康地行走時，便十分高興地在〈登泰山九依皇祖詩韻〉中說：「八旬母仍康步，六十六兒微白頭……」。⁶²由此可見他的孝心和孝行。

在乾隆皇帝多次奉太后外出巡狩的活動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關他們南巡的史事。由於《欽定南巡盛典》（1791）一書中詳細記載了各種相關資料，據此，我們可以了解當年乾隆皇帝奉太后四次南巡時的盛況。而由這些記載，我們也可以推想他每一次外出巡狩時的景況。

四、南巡盛況

乾隆皇帝以康熙皇帝為榜樣，東巡西狩次數頻繁，已如前述。但是他們頻仍的出外巡狩並非只是為了壯遊各地美景，而往往都具有政治、軍事、宗教、與文化等特定的目的。比如赴熱河秋獮乃為遵守祖制，鍛鍊八旗子弟騎射之術，具有軍事訓練的意義；同時也可會合蒙古各部王公，聯絡情誼，強化政治關係。幸五臺、登泰山，乃為祈福，具宗教目的。赴曲阜祭孔，乃為崇儒，具有教化之義；同時可能藉此籠絡漢人士子之心。出關到東北謁祖陵，乃為飲水思源、敬天法祖。至於這兩位皇帝頻繁而大規模的下六次江南之舉，實質上兼具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與藝術活動的多重意義。

在政治方面，清朝入關之初，南明（1645-1661）政權在江浙地區續存，與之抗衡；後來清兵以高壓屠殺和頒布「薙髮令」等方式逼迫當地人民就範；再加上

61 例見（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5，頁534-535），卷18，頁1-2，〈恭奉皇太后南巡啟蹕再疊前韻〉注。

62（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7，頁882），卷36，頁19-20。

滿、漢文化不同，因此造成了江、浙地區深沈的民怨。康熙皇帝親政之後便試圖以懷柔政策籠絡此地民心。因此，他在南巡時便親赴江寧祭拜明太祖（1328 生；1368-1398 在位）孝陵，又到紹興祭拜大禹廟。且對江、浙地區的府縣學特別恩賜增額取士，藉這些措施表現他對漢文化和歷史的尊重和對士人的關懷。在經濟方面，江、浙地區自宋（960-1279）、元（1260-1368）以來便是全中國的財富中心，人文薈萃，風景秀麗，加上京杭運河始於北京、貫穿河北南部、山東、江蘇、而終於浙江杭州，是帝國東部、南北交通的樞紐。賴此漕運，南方的糧食魚鹽和各種民生物品得以送到北方，因此它也是當時全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動脈。但在清初，因黃河在江蘇北部奪淮河河道入海，經常氾濫，造成這個地區的水澇；因此，康熙和乾隆二帝便利用南巡來視察這個地區的水利工程。確保這個地區長久的安定繁榮，和籠絡江南的士紳民情，使之效忠朝廷，這有關政治和經濟的目的，應是康熙和乾隆六次南巡的主要動因。此外，沿途巡察各地吏治和檢閱地方軍事，以及遊覽江南秀麗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也是吸引他們一再往訪的要素。基於這些因素，因此，康熙和乾隆二帝才會那樣不計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長途跋涉，六次南巡。以下僅略談一些和乾隆皇帝南巡相關的問題。

（一）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日期

關於康熙和乾隆二帝各自六次南巡的年代，一般清史文獻都有記載，不難得知。但至於他們每次南巡的確切日期和天數，許多學者，如左步青和何慕文（Maxwell K.Hearn）等人，都曾在他們所作的相關論文中提到。⁶³ 其中何慕文且曾將康熙、乾隆二帝每次南巡的日期換算出西曆，並且計算出他們每次南巡來回的天數，並列表呈現，可謂相當詳細，有助於中、西方研究者對這問題的了解；但其表中仍有一些小小的失誤。由於本文只談乾隆皇帝的南巡，因此個人便進一步查證分藏在北京歷史檔案館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乾隆朝起居注冊》、和《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二書，並對照中西曆表，⁶⁴ 而對何慕文表中的資料小有補正，參見以下表中所示。

63 見左步青，〈乾隆南巡〉，《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2期，頁23-37，72；Maxwell Hearn, "Document and Portrait of the Southern Tour Painting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in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ed. Ju-hsi Chou and Claudia Brown, (Phoenix: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98.

64 陳垣，《中西回史日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頁876-892。

表一 乾隆皇帝南巡年代、日期、和天數表

南巡次第	年歲	紀年：乾隆	出發日期	回宮日期	天數	皇太后／隨行皇子	資料出處 起居：起居注冊／實：實錄
一	41	16 (辛亥) (1751)	1-13 (辛亥) = 西：2-8	(正) 5-4 (庚子) = 西：5-28 ⁶⁵	110 ⁶⁶	奉太后	(京)起居： 10:10-94實： 380:18-388:4 (v.8:5713-5804)
二	47	22 (丁丑) (1757)	1-11 (癸卯) = 西：2-28	4-26 (丁亥) = 西：612	105	奉太后	(臺)起居： 16:24-153實： 530:23-537:28 (v.11:7692-7800)
三	52	27 (壬午) (1762)	1-12 (丙午) = 西：2-5	(正) 5-8 (辛丑) = 西：5-31 ⁶⁷	106 ⁶⁸	奉太后	(臺)起居： 21:14-148實： 652:11-660:6 (v.21:14-148)
四	55	30 (乙酉) (1765)	1-16 (壬戌) = 西：2-5	4-21 (丙寅) =西：6-9 (該年閏二月)	125 ⁶⁹	奉太后	(臺)起居： 24:14-188實： 727:1-735:3 (v.15:10419-10504)
五	70	45 (庚子) (1780)	1-12 (辛卯) = 西：2-16	5-9 (丁亥) = 西：6-11	117	無	(臺)起居： 30:13-91實： 1098:19-1106:16 (v.22:16144-16230)
六	74	49 (甲辰) (1784)	1-21 (丁未) = 西：2-11	4-23 (丁未) = 西：6-10 (該年閏三月)	121	皇子三人：永理、顥琰、永璘	(臺)起居： 34:22-175實： 1197:6-1205:13 (v.24:17475-17591)

資料出處：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皇帝起居注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清）慶桂等編，《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Maxwell Hearn, "Document and Portrait: The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 Painting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98.上之表；陳垣，《中西回史日曆》，頁876-892。

65 該年閏五月，Hearn 因誤認此為閏五月之事，故其表中作 6-26。

66 Hearn 表中作 139。

67 該年閏五月，Hearn 誤認此閏五月之事，故其表中作 5-4 = 西 5-27。

68 Hearn 表中作 113。

69 Hearn 表中作 124。

從以上的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之中，前四次都是奉太后同行，最後一次才攜三位皇子同行。其實與他同行的還有皇后和一些妃嬪，但是這部份他卻隱而不提。值得注意的是，他六次南巡在時間上都十分規律化：他每次南巡出發的時間都訂在元宵節（農曆正月十五日）的前後，但必須是春分（陽曆二月四日）之後。而且，他每次南巡費時都長達三到四個月之久：最短一〇五（105）天，最長一二一（121）天。通常他多在清明節（陽曆四月五日）之後才從杭州回鑾，離開江南。而當他返抵北京之時多半是在農曆四月底或五月初；那時的北方還未進入夏天。簡言之，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在時段上的規劃都經特殊的安排，主要是配合南北兩地在氣候上的差異。譬如，他都選擇在農曆開春一、二月間，當北方還相當寒冷時南行；路上費時約一個月左右；三月到了江南，正好享受江南春暖花開的美景；然後在清明節左右，趁江南暑熱來臨之前回鑾；而到達北京時約在四月底和五月間，那時夏天還未來臨，因此天氣十分舒適。這種時段上的安排，也反映了游牧民族順應季節變化而遷徙的習慣。

縱然如此，但是，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時間之所以都選擇在初春之際離京，暮春之前回鑾的原因，並非只是為了避開北方的天寒地凍，遠到江南享受春天明媚的湖光山色和遊覽各地名勝，而是另有其他更重要的理由。其一，是趁春寒乍暖便於行動時，沿途察訪吏治民情；到江寧和杭州等重要城市校場檢閱各地駐軍；到各地宣撫百姓，籠絡民心。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利用往返路程之便，視察江蘇北部各地河工和浙江海塘的治水工程；特別是要趕在江南梅雨季節（農曆五月）未來臨之前，勘查江蘇和山東接壤處，也就是徐州附近，因黃河奪淮河河道而常造成水澇地區的堤防設施，和檢視江浙沿海海塘工程的改善情形。

依個人所見，在這些正當的理由之外，應該還有他本人和太后對於江南美景的著迷。因此，他從乾隆十六年（1751）開始，到乾隆三十年（1765）為止，短短的十四年之間，四度奉太后南巡，而每次南巡都是陣容浩大，所費不貲。一趟南巡來回路程大約六千多里，可謂遙遠而艱辛。當乾隆三十年，他們第四次南巡時，太后已經七十四歲了。乾隆皇帝有感於此，所以當他在回鑾渡黃河時，便暗自決定，以後不再奉母南巡。⁷⁰ 此後他暫罷南巡十五年，一直等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也就是太后過世三年之後，他才再作第五度南巡，那時他七十歲。乾隆四十九年

70（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6，頁102），卷50，頁6，〈渡黃河述事〉。

(1784)，他作了最後一次南巡；那時他已經七十四歲了。他之所以選擇在那個年齡作最後一次南巡，可能是因太后最後一次南巡時，年正七十四歲的緣故，所以他便以此為範例。這令人想起他的另外一個孝行：由於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所以他在登基不久後，便決定自己只願在位六十年，因此便不會超過康熙皇帝在位的年限。由此可見，在乾隆皇帝心中對太后的孝心之誠摯，有如他對康熙皇帝一般。在最後一次的南巡中，他第一次命令他的三個皇子：永理、永琰(嘉慶皇帝即位後改名顥琰)、和永璘隨行。他的目的不但是想藉此增廣他們三人的見聞，而且也想藉他們這次參與南巡的經驗作為一種政治見習。正如他在當次南巡途中所作〈御製南巡記〉一文中所說的：

予臨御五十歲，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故茲六度之巡，攜諸皇子以來，俾視予躬之如何無私也；視扈蹕諸臣以至僕役之如何守法也；視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也；視各省民人之如何瞻覲親近也。⁷¹

由上文中可見乾隆皇帝自認為他南巡最重要目的，是為了巡視、督導江、浙地區的治水工程；而他在這方面的具體成效也可比美他在軍事上另一偉大的成就：那便是多次對清帝國西邊用兵平亂的勝利；而這兩件大事正是他在位五十年以來最重要的政績。此外，同樣重要的是，他在第六次南巡時特別攜三個皇子隨行的目的，主要是要讓他們見證他自己的行事如何無私，大小官吏和隨從如何守法，百姓如何愛戴他等等。由此可見他將自己的六度南巡如此加以合理化、正當化、和理想化，並且將它賦予了十分重要的意義。雖然，事實上由於他的數度南巡，已在人力和物力上造成了巨大的耗損，加重了國庫的負擔，但他在這裡卻完全不提。⁷² 相反的，他還特別以圖像和文字記錄了南巡的盛況。

(二) 乾隆皇帝南巡的圖史紀錄

乾隆皇帝命令徐揚(活動於1751-1776)和其他的院畫家，以他第一次南巡的經過為內容，繪製了一套十二長卷的〈乾隆皇帝南巡圖〉(圖8)。乾隆皇帝命人繪

71 見(清)阿桂等編，《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58，頁1-3)，卷首，上；又，該次南巡後他訓諸皇子之事，見(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9，頁380)，卷9，頁10，〈南巡迴蹕至御園之作〉。

72 關於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相關問題之研究，參見高王凌，《馬上朝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此項資料承陳國棟教授提供，特此致謝。

製〈南巡圖〉的行為也是仿效康熙皇帝的模式。⁷³ 負責繪製〈乾隆皇帝南巡圖〉的徐揚為蘇州人，長於繪製城市繁華景觀，如〈盛世滋生圖〉（1759）（圖9），便是描繪蘇州城內外的景觀。徐揚在乾隆十六年（1751），當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時，在蘇州被徵召進入畫院。他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奉命製作〈乾隆皇帝南巡圖〉。全圖共有十二長卷，完成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當年正值乾隆皇帝六十大壽；因此，此圖之完成正具有祝壽之意。這套圖卷原為絹本，如今已部分佚失，而存世的七卷則分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其他公私立收藏者等處。另外徐揚又奉命製作了一套紙本的〈乾隆皇帝南巡圖〉，完成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今藏北京國家博物館。⁷⁴

在從前沒有照相存真的年代，這類寫實性的繪卷，具有歷史記實的意義。不過由於它們在內容上只是擇要地描繪二帝南巡時某些特殊景點和重要活動，而且有時會因基於藝術表現效果的考慮，而強調、或簡化某些現象的描寫，因此，無法詳細地呈現整個歷史事件發生的過程。換言之，它們只能作為二帝南巡事件在視覺上的參考資料，其詳盡程度與真實性無法與文獻相比。

或許有鑑於圖畫在記實上的限制，因此乾隆皇帝又命高晉（？-1779）記載了乾隆三十年（1765）他第四次南巡的相關要事。高晉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完成了《南巡盛典前編》。乾隆皇帝特別在此書前面寫了一篇〈御製南巡盛典序〉。此書和前一年徐揚所完成的絹本〈乾隆皇帝南巡圖〉相應；左圖右史，圖史互證，加強了南巡事件的具像化。由此也可證乾隆皇帝對自己南巡事件的重視。但南巡之事在此之後仍繼續進行了兩次。基於此，乾隆皇帝又命薩載（？-1786）等人繼續記載他第六次南巡之事。薩載等人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完成了《南巡盛典續編》。乾隆皇帝又特別在該書前寫了一篇〈御製南巡記〉；那時他正在南巡途

73 按康熙皇帝對於自己六度下江南之盛舉，認為意義非凡，因此命令院畫家宋駿業（？-1713）和王翬（1632-1717）等人，以他第二次南巡為內容，繪製了一套十二長卷的《康熙皇帝南巡圖》。圖中所繪為他第二次南巡，從京城出發，登泰山、渡黃河、過長江、沿途視察河工；經杭州，往紹興祭禹陵；到江寧，校閱駐軍，和探訪蘇州名勝後再渡江北返等活動。這一套圖卷現已分散，分別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法國圖書館、和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地。關於《康熙皇帝南巡圖》的研究，參見 Maxwell Hearn, "Document and Portrait: The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 Painting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和他的博士論文 "The Kangxi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 A Narrative Program by Wang Hui,"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0).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其中第一、第九、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等五卷；相關圖版和說明，參見聶崇正、楊新，〈《康熙南巡圖》的繪製〉，《紫禁城》，1980年4期，頁16-17。又、遼寧省博物館收藏其中一卷的稿本，內容表現南巡隊伍經過山東泰山一帶。

74 關於《乾隆皇帝南巡圖》的研究與藏地，詳見 Maxwell Hearn 的論文，見註73。特別是頁117-119。

中。⁷⁵ 或許仍有鑑於二書在體例上出現不統一，和內容上有重複之處，因此，乾隆皇帝在此之後，又命阿桂（1717-1797）、和珅（1750-1799）、王杰（1725-1805）、董誥（1740-1818）、福康安（1753-1796）、和慶桂（1737-1816）等人，依據高晉的《南巡盛典前編》，和薩載的《南巡盛典續編》，刪其重複，統一體例，而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完成了《欽定南巡盛典》一書。全書一百卷，內分十二門；依序為：天章（卷 1-24）、恩綸（卷 25-30）、蠲除（卷 31-34）、河防（卷 35-54）、海塘（卷 55-64）、祀典（卷 65-68）、褒賞（卷 69-73）、籲俊（卷 74-75）、閱武（卷 76-77）、程塗（卷 78-80）、名勝（卷 81-88）、和奏議（卷 89-100）等。⁷⁶

由以上本書十二門的排序，和各門所含卷數之多寡，可以反映出編書者的編輯原則，基本上是依照這些議題的重要性，和各類資料詳盡的程度，而後排定了各門的先後順序。其中〈天章〉居首，收錄了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御製詩、文、表、記等作，共二十四卷，其篇幅幾乎佔了全書（一百卷）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見天威之凜然，以及群臣之阿諛。其次，為〈奏議〉十卷（卷 89-100），詳記有關六次南巡的各類相關奏議；足證此書的史料價值。其三，為〈河防〉（卷 35-54）、和〈海塘〉（卷 55-64），各有十卷，文字之外有些附有簡圖說明；可見南巡之事，治河為主要事項。其四，為〈名勝〉八卷（卷 81-88），其中包括乾隆皇帝南巡沿途所遊各地的名勝景點，和行宮之所在。此書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進呈，當時乾隆皇帝八十一歲。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書進呈的前、後一年，各有一項重要的文化業績完成，比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印了全套的滿文《大藏經》；⁷⁷ 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則由阿桂等進呈所編成的《八旬萬壽盛典》一百卷。⁷⁸ 以上三套重要的書籍既都完成於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的當年和前後一年，因此它們都可以看作是當時臣下有意的規劃，藉此專為慶賀乾隆皇帝的八旬萬壽，也藉此肯定他生平重要的治績和文化成就。

根據《欽定南巡盛典》的資料，我們得知乾隆皇帝南巡的陣容浩大。由於事關朝廷與地方在各種人力與物力上的配合，因此，在他每次南巡之前，執事者都經

75 以上二書，參見（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8，頁 9-15），卷首上，頁 16-28。

76 參見（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8，頁 12-24），卷首，下，頁 1-19。

77 參見莊吉發，〈國立故宮博物館藏《大藏經》滿文譯本研究〉，收入莊吉發，《清史論集》，冊 3，頁 27-96。

78 （清）阿桂等，《八旬萬壽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0-661）。

詳細的規劃。基本上，在每次南巡的前一年，執事者都要奏明所有相關事項的詳細規劃案。這些上奏的議案都收錄於《欽定南巡盛典》的〈奏議〉門中。以下擇其大要，略談乾隆皇帝幾次南巡時，基本的程途與各種配備的情形，包括：隨行官員和兵丁，和使用的各種交通工具，以及沿途重要的行宮和景點。由其中我們可以了解他每次南巡的路程和規模的大概情形。

（三）乾隆皇帝南巡程途的問題

先看乾隆皇帝南巡在程途方面的規劃情形。以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為例，在它的前一年，即乾隆十五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嚮導統領努三和兆惠便提出有關次年南巡程途的奏文。根據他們的規劃，那次南巡的路線是：以京城為起迄，來回經過直隸、山東、江蘇、和浙江（圖 10）。而且依規劃，在南巡途中，原則上大約每隔四十里左右便設二處尖營，供皇帝、太后、和隨從等人員休息；而每隔八十里左右，便有一處行宮（或大營、或水大營）提供皇帝和太后等人住宿。這次預先規劃的里數和駐蹕站如下：

1. 由京城出發，經直隸趙北口，到山東濟南；再經泰安，到江南宿遷縣運河的順河集馬頭。這段路為旱程，計一千四百九十（1490）里，分二十四（24）站停駐。

2. 由順河集登舟，視察沿途的朱家閘、九里崗、駱馬湖、江南引河等處的河工，一直到孫家渡為止。這段路為水程，計一百五十四（154）里，分四（4）站停駐。

3. 由徐家渡過黃河，經由河堤，視察惠濟閘運河口和木龍等處的河工和閘口，到直隸廠營盤駐蹕。這段路程計四十二（42）里。

4. 由直隸廠至高家堰堤視察，計三十三（33）里。

5. 由直隸廠登舟，渡淮河，經淮安府城，視察高郵東地南關和車邏壩等處的河道和堤工。

6. 由揚州府平山堂渡揚子江，至鎮江，在金山寺駐蹕。這段路為水程，計三百七十七（377）哩，分八（8）站停駐。

7. 由金山寺至江寧省城為旱程，計一百三十四（134）里，分兩（2）站停駐。

8. 由金山寺至鎮江府城為水程；再經無錫惠山園至蘇州府。這段路計程三百二十五（325）里，分五（5）站。

9. 由蘇州府入浙江境，經嘉興煙雨樓至杭州府行宮。這段路為水程，計三百三十（330）里，分五站。

10. 由杭州過錢塘江至紹興府，計水程一百十五（115）里，分兩（2）站停駐。

根據以上的資料，可知乾隆十五年所預估，在次年所將舉行第一次南巡的程途兼採陸路與水路。簡計南下時所走的旱程有一千七百五十八（1758）里，停駐三十三（33）站；水程有一千三百四十六（1346）里，停駐十九（19）站；合計陸程與水程為三千一百〇四（3104）里，停駐五十二（52）站。又回鑾時由於不再經過江寧和濟南等地，因此可減去一些路程和七站停駐點，但仍有旱程一千四百四十二（1442）里，停駐二十八（28）；水程一千二百九十四（1294）里，停駐十七（17）站。總計：該次南巡的往返路程和停駐站，預估為水陸程途五千八百四十（5840）里，停駐站九十七（97）處，如表二所示：

表二 乾隆十五年預估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程途里數與停駐站數簡表

程 途	取 徑	里 數	駐蹕站數
去 程	陸路	1758里	33站
	水路	1346里	19站
	小計	共3104里	52站
回 程	陸路	1442里	28站
	水路	1294里	17站
	小計	共2736里	45站
合計		5840里	97站

資料出處：（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59，頁256-257），卷79，頁1-3，〈程途〉。

以上所示為乾隆十五年，臣下為次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所規劃的路線和駐蹕資料。雖然以後的五次南巡基本上都依照這條路線和駐蹕點行動；但是事實上，每次都視需要而有一些調整。最明顯的是，乾隆皇帝在第一次南巡時曾到紹興大禹廟；但其後的五次都不再到紹興去。因此，他每次的實際行程里數和駐蹕點都變化，比如他在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時，因考慮到當時太后已年高七十四歲，所以在沿途已預先多增建了一些行宮，以供住宿。又如，當他第五次（乾隆四十五年）和第六次（乾隆四十九年）南巡時，執事人員因考慮到他已屆七十高齡，不堪長途跋涉了，因此便又在沿途再增建一些行宮，供他住宿。又、實際上，個人根據

《欽定南巡盛典》卷八十，〈程塗〉中的資料，得知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所行經各地的最長里數和停憩點，明顯多於上述第一次南巡前所預估的各項數字。謹列表（表三）說明如下：

表三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實際最長程塗里數和駐蹕站數表

程塗	地區	行宮停駐次數	尖營休憩次數	大營停駐次數	水大營停駐次數	里數	備註／出處 《欽定南巡盛典》 卷80
來回 雙程	直隸	9×2=18	15×2=30			579×2=1158	頁1-4
	山東	15×2=30	25×2=50			888×2=1776	頁4-12
去程	蘇州	11	9	8		1089.2	頁12-22
	浙江	4	4（往返紹興禹陵，來回+2=6）	2（往返紹興，來回+4=6）		315（+112=427）	頁22-25。按：第一次南巡往返紹興禹陵，來回附加尖營（2）、大營（4）、里數（112）
回程	浙江	1				134	頁25-28
	江蘇	4	5		7	629	頁28-32
	山東	2			13	1020	頁32-37
總計		70	94（往返紹興，來回+2=96）	12（往返紹興，來回+4=16）	20	6121.2（如往返紹興，來回+112=6233.2）	第一次南巡往返紹興禹陵，來回附加尖營（2）、大營（4）、里數（112）

資料出處：（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卷80，〈程塗〉，頁1-37。

* 以上里程數尚未完整計入乾隆皇帝沿途登岸到各小府／縣城的巡視，和到各景點的遊覽里程。

此外，在前四次的南巡來回途中，乾隆皇帝並非一直都陪在太后身邊。在前三次回鑾時，他必須與太后分途，自行去各地巡視河工和檢閱軍事：當他們離開了江南到蘇北直隸廠後，乾隆皇帝便和太后分道北上；兩人到山東德州再會合。他自己走水程，視察河工，通常他都從清江浦出發，走水程往徐州，沿途視察河工；再沿大運河北上，至山東德州。而太后則和陪侍人員從直隸廠走陸路到德州。二人在德州會合後再一同走陸路北返。途中，乾隆皇帝有時也會繞道往泰山祭拜，太后則不

一定每次都同行。⁷⁹但這種兩人分合的規劃到了第四次南巡時，便有了改變。在那次南巡中，乾隆皇帝可能考慮到太后年事已高，所以回鑾時不放心與她分道北上，因此，離開江南後兩人都一同走運河水程到德州，然後走陸路返回北京。這種時常改變舟行或陸行的規劃，可能是為了避免在長途旅行中一直採用同一種交通方式以至於造成單調和疲勞的感覺之故。

(四) 乾隆皇帝南巡時的隨行人員與交通工具

乾隆皇帝南巡時有大量人員隨行和使用各種交通工具。以下試舉數例，以窺其大概。首先，在隨行人員方面，乾隆皇帝南巡時的隨行人員，大致上包括皇室成員、宗室成員、各類官員、護衛、和兵丁等等。先看主要從行的皇室成員。從第一次到第四次南巡中，乾隆皇帝主要是奉太后南巡；隨行的還有繼后烏拉納喇氏和其他妃嬪等；第六次才見隨行的永理、永琰、和永璘等三個皇子。另外，每次隨行的還有宗室人員，和機要官員。後者包括：軍機大臣、重要詞臣、批本奏事等；因為沿途乾隆皇帝還要隨時處理來自朝中留守大臣的文書報告，和全國各處的重要公文和奏摺。換言之，他的每次南巡也等同於他每次出外東巡、西狩、和木蘭秋獮一般，在旅途中處理朝政。這種活動式的馬上朝廷，沿用了游牧民族的行政特色。

其次，在兵丁方面，他每次南巡所用的隨行兵丁人數眾多，種類各別，端看每段路程上的環境條件所需而調動，從數十人和數千人不等。據乾隆二十九年（1764）臣下預估，次年他的第四次南巡，在回鑾時「……渡黃，上船人數二千八百七十一人，……」。⁸⁰又據乾隆四十八年，臣下所預估，次年他在第六次南巡之中，各類侍衛兵丁之數，例如「……前鋒護軍仍派七百名……拉船牽繹兵由河兵內揀派，……到江南登船時，將兵丁酌減，只揀派五百名，章京四十員；虎鎗營侍衛兵丁七十員，仍照向例，揀選四十名當差……」。⁸¹

79 有關乾隆皇帝與太后在四次南巡來回途中的行進路線，參見本文表一中所列《乾隆皇帝起居注》中的相關資料；(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275-293)，卷 80，〈程塗〉，頁 1-37；(清)清高宗《御製詩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4，頁 365-366)，卷 72，頁 12-13；又見《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5，頁 617)，卷 24，頁 1。

80 (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487-488)，卷 96，頁 7-8。

81 (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526-527)，卷 99，頁 12-14。

再其次，在交通工具方面，每次南巡都動用了許多的車輛、馬匹、駱駝、和船隻等；其數每次南巡不同。⁸² 先看車輛方面：依乾隆二十九年（1764），臣下預估次年他第四次南巡來回所需的車輛，每趟約八百（800）輛（次）；而每輛車需用四匹騾／馬，因此共需騾／馬三千二百（3200）匹。這比其前乾隆皇帝每次到熱河秋獮時，內務府備差回車六百（600）餘輛之數，多出了二百（200）輛。⁸³ 這是依據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南巡，回鑾時原備車四百（400）輛之數，而從寬預估的；因為那一次南巡回鑾時，乾隆皇帝只用車二百十二（212）輛；而太后只用了三、四十（30-40）輛；兩對人馬總共用了三百六十（360）輛左右。⁸⁴ 果然，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起程時，實際上的用車數只有三百四十八（348）輛，遠在事先所預估的數目（800 輛）之內。⁸⁵

再看馬匹方面：依據乾隆四十四年（1779），臣下所預估他次年的第五次南巡所需的馬匹數如下：江北四千匹，江南四千匹，江、浙地區二千匹，共約一萬匹，用以馱運行李和拉車之用；而需用這許多馬匹的原因，是由於牠們必須沿途輪休，以防累斃。⁸⁶ 至於在各地方巡訪時所需用到的馬匹，有一部份則需由各地駐防提供，如：「回鑾時，德州劉智廟處備馬一千八百匹，分別由青州滿洲營備八百匹，直隸綠營備一千匹。」⁸⁷ 由此可知，在南巡沿途上的各地方行政單位，都會被指派提供各種資源，以支援所需。

又、在駱駝方面：依乾隆四十四年所估，次年他第五次南巡時，「……武備院稱，需駝三百五十餘隻；茶膳房，需駝四十隻；途次更換，需七十五隻；共約四百六十餘隻。」⁸⁸

此外，在船隻方面：依乾隆二十九年，臣下所預估，次年他第四次南巡所必需的船隻有許多種，包括：前行官員使用的船隻，和皇帝和皇室成員的專用船隻等兩大類。前行的官員單位有十六個，依序為：(1) 御前大臣、(2) 領侍衛大臣、(3) 軍機大臣、(4) 前清門行走大臣、(5) 侍衛、(6) 裝載御馬、(7) 上駟院、(8) 武備

82 (清) 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372-538)，卷 89-100。

83 (清) 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481)，卷 95，頁 21。

84 (清) 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487)，卷 96，頁 6-7。

85 (清) 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487)，卷 96，頁 6-7。

86 (清) 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503-504)，卷 97，頁 14-15。

87 (清) 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503-504)，卷 97，頁 14-15。

88 (清) 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509-510)，卷 98，頁 7-8。

院、(9)侍衛官員、(10)鑾儀衛、(11)章京、(12)批本奏事、(13)軍機處、(14)侍衛處、(15)內閣、和(16)兵部官員等等。⁸⁹後面接著才是皇帝和皇室成員專用的船隻。依乾隆四十四年的奏文，得知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時，執事人員在江浙地區所準備專供皇帝和皇家使用的船隻有十艘，分為八種，包括：(1)安福鱸一（皇帝專用）、(2)行春舫一（皇帝游賞時的行船）、(3)如意船一（僅為皇帝幸海寧州城專用）⁹⁰、(4)翔鳳艇一（太后／后妃專用）、(5)沙飛船二（皇室人員使用）、(6)湖船二（皇室人員使用）、(7)撲拉船一（皇室人員使用）、(8)烏圖理船一（皇室人員使用）。另外，在皇家船隊之前，還有御舟前引威武船，⁹¹和隨行船隻，其數量因時因地而不同。比如，當乾隆皇帝回鑾離開江南，從清江浦經徐州，走大運河的水程中，也有船隻前導和隨行。依乾隆三十年三月初九日，臣下的奏文中所記：在第四次南巡途中，「隨至德州船一百六十二隻，內應前行船五十五隻……（加上其他類船隻），共船四百二十隻」。⁹²以上這種種數量龐大的船隻，儼然成為一組綿延數里的行動船隊。

以上所記，僅為個人擇錄乾隆皇帝六度南巡中，幾則有關隨行兵丁人數和各種交通工具之史實。由此可以推想當日南巡時，其行伍之浩蕩，和場面之壯觀。如上所述，乾隆皇帝曾經六度南巡，第一次南巡為乾隆十六年（1751），當時他四十一歲，正值壯年；最後一次則為乾隆四十九年（1784），當時他已七十四歲，期間共跨三十三年。其中，前四次（乾隆十六年～三十年，1751-1765）他都奉太后同行。他每次南巡都領導著那樣一隻威武豪華又壯觀的隊伍，在初春時節離開酷寒的北方，一路上走走停停；到江南時已是暮春三月，正是鶯飛草長的時節。過了清明節，這支豪華隊伍再從江南，沿途北上，約在端午節前後回到宮中。他每趟南巡耗時都在百日以上，所行走的水陸程塗，來回長達六千里以上，所經之處人馬喧騰、旌旗蔽空、舳艫數里。其聲勢之浩蕩，場面之壯觀，堪稱史上僅見。

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七十四歲，六度南巡。在此之後他便不再南巡；其原因可能有五個：其一，他不敢逾越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之例。其二，他不敢逾越其母孝聖皇太后在七十四歲時（乾隆三十年，1765）作她最後一次南巡之例。其三，事實上，南巡之旅，路途遙遠，往返費時，而他畢竟已漸年老，精力不比從

89（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527），卷 99，頁 14。

90（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274），卷 79，頁 37。

91（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503），卷 97，頁 13-14。

92（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493-494），卷 96，頁 19-20。

前，不宜再作這種長途旅行了。其四，江南美景重點他大概也都遊歷過了；而各地河工和海塘建設也都告一段落了。其五、也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多次南巡場面浩大，所費不貲，國庫已漸不支了。基於這種原因，所以在那次之後他決定不再南巡。

（五）乾隆皇帝南巡沿途之重要行宮和名勝景點

乾隆皇帝在每次來回共六千（6000）里以上的南巡途中，大致上每隔約八十里左右，便設有行宮（或行館、行殿、行幄）、和營盤（尖營、大營、水大營）以備休憩和駐蹕。其數最多時，略計：行宮約有七十（70）個左右，尖營約九十四（94），大營約十二（12）個，水大營約二十（20）個（見表四）。這些行宮的規模大小不一。新舊都有，包括既有的名勝古剎、官署、名園、和新舊行宮等。乾隆三十年，他第四次南巡之前，執事人員因慮太后年已七十多，住在營盤不適，因此在有些地方又增建數座行宮以便住宿。在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之前，執事人員又因同樣的原因，為他增建數座行宮。雖然乾隆皇帝一再下令新建行宮的用度盡量簡約；但是每座簡單的行宮所費還是相當可觀。例如，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十日，薩載奏言：「淮北添建行宮三座，共用銀八萬九千五百（89500）餘兩」。換言之，每座新建行宮平均約用銀將近三萬（30000）兩。⁹³ 如與當時服務於宮中一般院畫家的月俸（三兩）相較，則可知當時每座行宮所費，等於是那些院畫家一萬個月（ 3×10000 ）（或 833 年）的薪俸所得。而如再加上它四周相關的建設費用，其數就更驚人了。據相同資料中薩載所奏，僅為那次（第五次）南巡所作的各項新添和修舊工程，隨工陳設，並磚石、橋路、大船、車、騾等項，共計用銀五十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八（511998）兩。⁹⁴ 此數等同於康熙時期的江寧織造曹寅（1658-1712；曹雪芹的祖父）年薪一〇五（105）兩的四千八百七十六（4876）倍。⁹⁵ 由此可見帝王生活之基本配備，雖說盡量簡約，仍非一般百姓所可想像和企及的。

乾隆皇帝南巡時所住的那些比較著名的行宮、行館、和行殿，多位在景觀優美的名勝區，或富有文化和歷史意義的古建築和園林中。串連這些地標便可建構當

93（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518），卷 98，頁 24-25。

94（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9，頁 518），卷 98，頁 24-25。

95 曹寅的年薪，參見周汝昌，《江寧織造與曹家》（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75，其中引用康熙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巡撫安徽陳汝器《奏銷江寧織造支過俸餉文冊》中所記：「織造壹員曹寅，每年應支俸銀壹百五兩外……」。

年乾隆皇帝與扈從，一路南巡的具體行經路線。據個人簡略統計，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曾使用過至少七十處以上的行宮。在那當中，比較著名的約有五十三處（直隸八處，山東二十二處，江蘇十九處，浙江四處）。而且，這些行宮的附近又常有許多著名的景點；據個人估計，它們至少有九十多處以上。換言之，乾隆皇帝在南巡途中，可以令他和太后等人賞心悅目，流連忘返的名勝景點大約有一百五十處左右。⁹⁶ 而這些景點也常常反覆地成為他為詩作文的靈感來源和歌詠的對象。這些作品都可見於《欽定南巡盛典》的〈天章〉部份。

乾隆皇帝在他眾多有關南巡的詩文中，對那些行宮和周邊景點不斷重複歌詠抒情，顯見他對它們欣賞的程度。就中有許多江南地區的特殊景點，更令他難以忘懷；比如：在江蘇的鎮江金山寺、無錫惠山園、蘇州城外寒山寺、蘇州城內獅子林；在浙江的嘉興煙雨樓、海寧安瀾園、杭州西湖及周邊景點、以及寧波天一閣等等。對於以上景點，他除了以詩文詠歎之外，還命隨行畫家以繪畫記勝，後來又在北方皇家苑囿中加以仿建，藉以保留那些美景的形象。而在那些仿建的江南美景中，有許多是專為太后祝壽而特別建造的。

五、大慶壽典

乾隆皇帝對於太后每年的壽誕，從不草率。如：到慈寧宮祝壽；自製詩畫，與皇子、皇孫送壽禮；綵衣捧觴獻舞，都是慣例。「每萬壽慶辰，酒酣，帝躬起舞蹈，賞燈賜膳」。⁹⁷ 而每逢太后的大壽，則更加鋪張，安排各種大規模的慶祝、和祈福活動。換言之，乾隆皇帝每逢太后大壽（特別是六十、七十、八十歲）時，都大規模地預先在當年春天或秋天，以出外巡狩的方式（如前所述），令太后欣喜。除此之外，他更大規模地修建佛寺或園林，以事慶祝。而在太后大壽的當天（一月二十五日），更在宮中和京城內外同時舉行盛大而奢華的祝壽活動。其中最明顯的是乾隆十六年（1751）和二十六年（1761）前後兩次為太后祝壽的活動。這些活動所耗費的金額難以估計。

為了慶祝乾隆十六年（1751）太后六十歲的大壽，乾隆皇帝已在先前兩年

96 參見（清）阿桂等，《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8，頁 309-368），卷 83-87，〈名勝〉。

97 見章唐容輯，《清宮述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7，頁 845），卷 6，頁 23a，〈述內廷四〉。

動手準備修建清漪園（今頤和園）為她祝壽：乾隆十四年（1749），他先命人整治北京皇城西北郊的水系；乾隆十五年（1750），改甕山為萬壽山；乾隆十六年（1751），將山前的金海改稱昆明湖；又在萬壽山上修建大報恩延壽寺；⁹⁸ 乾隆十六年（1751），完成了以上大部份的工程。⁹⁹ 到了太后大壽之前又他率眾獻禮、上尊號。在這之前，太后已有的尊號為「崇慶慈宣惠康敦和」；現在又在後面加上「裕壽」兩字。¹⁰⁰ 生日當天，他又率眷屬、子孫、宗親、朝官等等在壽安宮舉行祝壽獻禮的儀式。¹⁰¹ 乾隆皇帝所獻之禮包括：自製詩文、書畫，各種珍寶、器用、和如意等等正式祝壽禮。¹⁰²

清漪園中有一些景點是乾隆皇帝在各次南巡後，仿江南美景而建的。如，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奉太后南巡歸來之後，便在萬壽山後，仿建了無錫惠山的寄暢園，名為惠山園（嘉慶時改為諧趣園），和蘇州街。他後來又在萬壽山前的昆明湖仿西湖蘇堤而建西堤六橋。又，乾隆二十三年（1758），他在第二次南巡（乾隆二十二年，1757）後，又在萬壽山的大報恩延壽寺側，為了仿照杭州六和塔而建一高塔，但該塔尚未建成時便毀於火；因此他便在原地改建了佛香閣（圖 11）。

乾隆二十六年（1761），正值太后七十歲大壽。當年元旦，適逢「五星連珠」，天現祥瑞；再加上感念「人生七十古來稀」的緣故，所以乾隆皇帝對他母親這次的壽誕所進行的活動項目更多，而且其花費也更驚人。首先，關於五星聯珠的現象，乾隆皇帝特別以詩文記盛；¹⁰³ 此外，又命院畫家作〈五星聯珠圖〉長卷（今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其次關於這次的祝壽活動，主要包括以下的四個項目：其一，事前在北京西郊修整明代已有的五塔寺（正覺寺，圖 12）和萬壽寺。按乾隆十六年（1751）和二十六年（1761），兩次修整五塔寺。光是它的工程費用就高達銀七萬六百二十（70620）兩；¹⁰⁴ 這等於是當時一個普通院畫家月銀（三兩）的二萬

98（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卷 34，頁 17，〈禮大報恩延壽寺〉。

99 參見孟亞男，《中國園林史》，頁 280-281。

100 同註 3。

101 于敏中，《國朝宮史》，卷 5，頁 45-46，〈典禮一·禮儀〉。

102 關於整個祝壽的儀式過程，詳見章唐容輯，《清宮述聞》，卷 6，〈述內廷四〉，頁 21a-23b，特別是 23a；又見（清）清高宗，《御製文集》（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1，頁 198-200），卷 23，頁 3-6，〈恭祝聖母皇太后萬壽無疆賦〉。

103（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5，頁 405），卷 9，頁 1，〈元旦試筆〉；又有文：〈恭祝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連珠〉，見其《御製文初集》（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1，頁 217-223），卷 25，頁 1-14。

104 向東，〈孝聖皇太后萬壽慶典時期的五塔寺〉，《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 年 1 期，頁 87-92。

三千五百四十（23540）倍，也等於是他一千九百六十一（1961）年的薪水。對照之下，顯見皇家用度之揮霍與豪奢。另外，又仿山西五臺山殊像寺，而在青山建寶相寺。¹⁰⁵ 其二，上尊號，在上述太后已有的尊號之後，又再加上「恭懿」二字。其三，太后生日當天，自清漪園經西直門、西安門、西華門，沿線佈署各個祝壽單位和熱鬧活動。同時，乾隆皇帝並命院畫家張廷彥等繪製〈崇慶皇太后萬壽圖〉（圖 13）以記其盛。¹⁰⁶ 這個舉動完全模仿康熙皇帝六十大壽時所作〈萬壽圖〉的前例。¹⁰⁷ 其四，生日當天太后接受各方祝壽：乾隆皇帝在壽安宮侍膳，在慈寧宮行慶賀禮，王大臣於慈寧門行禮。¹⁰⁸ 更有甚者乾隆三十六年（1771），太后八十大壽時，乾隆皇帝更大事慶祝。那次慶典的主要活動，包括以下的五個項目：

其一，預先在避暑山莊外圍建普陀宗乘之廟（小布達拉宮，圖 14），並重修北京黃寺，和功德寺，為太后祝壽。¹⁰⁹

其二，仿杭州聖因寺賈休十六羅漢像刻石，在西苑（北海）萬佛樓建了妙香亭十六羅漢像，為皇太后祝壽。¹¹⁰

其三，奉太后到泰山祭拜祈福（如前述）。

其四，生日當天，太后接受各方祝壽；乾隆皇帝在壽安宮侍膳，在壽康宮行慶賀禮，王大臣於慈寧門，庶官於午門行禮。¹¹¹

105 (清) 清高宗，《御製文二集》(上)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1，冊 441-443)，卷 26，頁 3-6。

106 此圖資料參見 Wim Crowel, *De Verboden Stad: Hofcultuur von de Chinese Keizers (1644-1911)* (The Forbidden City: Cour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1644-1911)) (Amsterdam: Nauta Dutilh, 1990), pp.138-145; 此項資料承蒙王正華教授提供，謹此致謝。又，此畫白描稿本和說明，參見聶崇正，〈四卷白描稿本內容的探討〉，華辰 2006 年秋季拍賣會，《中國書畫》目錄（北京：華辰拍賣公司，2006），675 號。

107 參見陳葆真，〈康熙皇帝《萬壽圖》與乾隆皇帝《八旬萬壽圖》的比較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013 年春，卷 30，3 期，頁 45-122。

108 見于敏中，《國朝宮史》，卷 5，〈典禮一·禮儀〉，頁 47；章唐容輯，《清宮述聞》，卷 6，頁 21a-23b；(清) 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6，頁 919)，卷 100，頁 36-37，〈冬至月廿五日聖母皇太后八旬大慶慈寧宮行禮喜感成什〉。

109 (清) 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6，頁 915)，卷 100，頁 29，〈普陀宗乘廟落成拈香得句〉；羅文華，《龍袍與袈裟》(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冊下，頁 369；(清) 清高宗，《御製文二集》(下)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1，頁 449-451)，卷 27，頁 7-10，〈普陀宗乘之廟碑文〉；〈重修功德碑記〉(同書，頁 448-449)，卷 27，頁 5-7。

110 參見孟亞男，《中國園林史》，頁 243。

111 見(清) 慶柱，《國朝宮史續編》，卷 15，頁 1-5，〈典禮九·盛典〉；章唐容輯，《清宮述聞》，卷 6，頁 23b。

其五，命畫工艾啟蒙（1708-1780）繪圖紀盛。¹¹² 當時艾啟蒙和其他畫工奉命所作的繪畫，可能便是現今所見的〈萬國來朝圖〉（圖 15）¹¹³ 和〈臚歡蒼景冊〉。現今存世標為〈萬國來朝圖〉的作品有四幅。它們的構圖類似，著重表現前景中所見各國使者朝貢候宣之狀，背景則為眾多宮殿。在本幅〈萬國來朝圖〉中只呈現各國使者帶著各種珍奇貢物聚在太和門外，等候召見，而沒有直接描繪太后在慈寧宮接受祝壽的場面。而在〈臚歡蒼景冊〉中的〈慈寧燕喜圖〉，則明顯呈現了乾隆皇帝綵衣獻觴，為母祝壽的情形（圖 16）。由其中乾隆皇帝的相貌望似六十左右來看，本幅極可能是那年所作。又、在另外一幅〈萬國來朝圖〉中可見乾隆皇帝手抱幼兒之狀。該圖可能作於乾隆四十九年，因在那年他的一首〈元旦試筆〉中有「古稀天子承天祐，冊九年臨萬國朝……」之句可以為證。¹¹⁴



乾隆皇帝對太后無時不顯現他的崇敬和感恩之心，因此，除了以上所見，在太后大壽當年上徽號之外，更在各種國家喜慶時，尊上加尊地冊尊皇太后並恭上徽號。這種情形共有九次；每次都以十分隆重的儀式舉行。¹¹⁵ 以下簡列乾隆皇帝為他母親上尊號的時間、理由和所上的徽號：

表四 孝聖皇太后歷年所獲徽號表

序號	時 間	事 由	徽 號
1	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	弘曆即位	崇慶皇太后
2	乾隆二年（1737）十二月	冊立皇后富察氏	崇慶慈宣皇太后
3	乾隆十四年（1749）四月	平金川	崇慶慈宣惠康皇太后
4	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	冊立皇后烏拉納喇氏	崇慶慈宣惠康敦和皇太后
5	乾隆十六年（1751）十一月	皇太后六十萬壽	崇慶慈宣惠康敦和裕壽皇太后
6	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	平準噶爾	崇慶慈宣惠康敦和裕壽純禧皇太后

112 見（清）慶桂，《國朝宮史續編》，卷 15，頁 5；章唐容輯，《清宮述聞》，卷 6，頁 23b，31a-b。

113 關於四幅〈萬國來朝圖〉的研究，參見蘇妙齡，〈乾隆朝《萬國來朝圖》研究〉，《史物論壇》，2007 年 4 期，頁 61-103，此項資料承王靜靈同學提供，特此致謝。

114 見（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9，頁 233），卷 1，頁 1。

115 其儀式參見（清）于敏中等，《國朝宮史》，卷 5，頁 16-26，〈典禮一〉，「冊尊皇太后並恭上徽號儀」。

序號	時 間	事 由	徽 號
7	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	皇太后七十萬壽	崇慶慈宣惠康敦和裕壽恭懿皇太后
8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	皇太后八十萬壽	崇慶慈宣惠康敦和裕壽恭懿安琪皇太后
9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	平定大小金川	崇慶慈宣惠康敦和裕壽恭懿安琪寧豫皇太后

資料來源：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2，頁17a-18a；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上，頁107-115；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卷214，頁891。

其中關於平定金川之事，乾隆皇帝不但有詩記其事，而且更命人作〈紅旌捷報圖〉（今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作為紀念。¹¹⁶ 由此也可見乾隆皇帝如何利用各種國家和皇室及私人的喜慶場合為太后尊上家尊的行為。於是，原來平凡的鈕祜祿氏在雍正時期先升為「熹妃」，再晉為「熹貴妃」；乾隆時期，先尊為「崇慶皇太后」，後累加徽號，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時已被尊稱為「崇慶慈宣惠康敦和裕壽恭懿安琪寧豫皇太后」。此時，她的尊榮幾乎已達極致了。

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二十三日，太后以八十六歲高壽逝世於圓明園的長春仙館。乾隆皇帝尊諡她為「孝聖慈宣惠康敦和敬天光聖憲皇后」，四月，葬於泰東陵。¹¹⁷ 失去了一生最親近的人，乾隆皇帝的哀痛長久無法釋懷。他將長春仙館改為佛堂；且每每觸景傷情，在他此後所作的詩中，時常流露出對她的思念之情。比如，他在太后剛過世後不久所作的輓詞，¹¹⁸ 和〈恭奉聖母梓宮往泰陵……〉¹¹⁹ 二詩中流露出他強烈的喪母之慟。這種感覺在同年底他所題王羲之（321-379）的〈快雪時晴帖〉中的一首詩中也可以看出來：「復雪叨天祝，自宵達曙連；……誠幸逢膏續，仍欣在臘前；無人相慰藉，獨立一酸然。」¹²⁰ 詩中一開始所說的是：為該年臘月得雪有利於農而欣喜；但到結尾時，他的這種欣喜之情卻又因無

116（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7，頁812），卷32，頁24；〈恭奉皇太后迴蹕至御園作〉；卷37，頁34-35，〈平定金川恭上皇太后徽號禮成誌慶〉；又參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頁109-181。

117 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2，頁17a-18a；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上，頁107-115；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卷214，頁891。

118 見（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8，頁44），卷42，頁19-20，〈聖母皇太后奄棄……因占輓詞……〉。

119（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8，頁50），卷42，頁31，〈恭奉聖母梓宮往泰陵是日啟程長句誌痛〉。

120 乾隆皇帝在此冊上的題識，前後歷時五十多年，共約七十四則，詳見陳葆真，〈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故宮學術季刊》，27卷2期（2009冬），頁127-192。關於此詩及解釋，見頁157。

法與他母親分享而轉為傷悲。一年後（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在所作〈長春仙館禮佛有感〉中懷念其母。¹²¹十七年後（乾隆五十九年，1794），他在〈遊獅子園〉一詩中，又想起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當康熙皇帝在此園中見到他的生母時，稱讚她是「有福之人」的往事。¹²²十八年後（乾隆六十年，1795），當他已經八十五歲時，在〈新正雍和宮瞻禮示諸皇子〉的詩中也提到：他曾將自己計畫於在位滿六十年時便退位之事告訴太后，但太后認為不必一定要如此作的往事。¹²³由以上這些詩中，可見不論太后已經逝世多久，然而，他對她的懷念是持久不變的。

從以上諸事中可證乾隆皇帝從登基之後，四十二年來對太后的孝養，可謂始終如一，無微不至。但這並不表示他對太后都是每事秉告或言聽計從。相反的，他一直嚴守清朝立國以來的祖訓：後宮不得干政；而且對於母族外戚也防範甚嚴。縱使貴如太后，她的父母想到圓明園宮內探親，也必得事先向皇帝申請，獲准後才可行，否則便算逾越。¹²⁴例如，在乾隆皇帝剛登基後不久，有一次內侍逕引太后的親弟進入宮內，在東六宮的蒼震門謝恩。乾隆皇帝得知後十分震怒，對侍者加以斥責，且令不得再犯。¹²⁵照理而言，他對自己的親生母舅不應如此不客氣；因此，這件事情在表面上看起來固然顯現出乾隆皇帝恪守祖宗家法的行為，和執行外人不得隨便進入後宮的規定；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它也反映了乾隆皇帝對於他母親的家族並未特別禮遇的事實。據個人推測他如此的行為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他的外祖父凌柱只是一個四品典儀內大臣，家世並不顯赫。其二，他的母舅才具平庸，所以他才未加以提拔重用。相對的，乾隆皇帝對於自己的皇后和貴妃的族人，只要是具有才幹，他都十分照顧。比如，他重用孝賢皇后（1712-1748）的哥哥傅恆（1720-1770）。傅恆一生立下許多戰功，被封為一等公。還有傅恆的兒子福康安（1753-1796），也因戰功而受爵。另外，他也重用慧賢皇貴妃（？-1746）的父親高斌（1683-1755）與兄弟高晉（？-1779）和高恆（生卒年不詳）。三人曾分別擔任

121（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8，頁106），卷46，頁5。

122（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1，頁361），卷91，頁6-7。

123（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1，頁392-393），卷93，頁5-6；同樣的事又記於（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1，頁439），卷96，頁3，〈恭謁泰東陵〉注；和《御製詩餘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1，頁591），卷4，頁5，〈恭謁泰東陵〉注。

124 見（清）于敏中等，《國朝宮史》，卷4，頁11-12，〈訓諭四〉，〈乾隆三年正月初三日〉條。

125（清）于敏中等，《國朝宮史》，卷4，頁7-8，〈乾隆元年三月四日〉條。

直隸和江、浙兩地的總督以及總管兩淮鹽政。¹²⁶ 由此可證，乾隆皇帝並非完全排斥外戚，但看他們是否具有才幹。

太后篤信佛教，她曾親手貼綉，製作佛像〈綠度母〉（圖 17，藏雍和宮）。有一次她向乾隆皇帝建議：順天府某處一佛寺殘破，應加修繕。乾隆皇帝雖然表面上順從她的囑咐，但卻隨即召來她的隨從，訓誡他們不得伺太后所好而隨便向她通報外界的相關消息；當然，也不得隨便引尼師入宮見太后。¹²⁷ 乾隆皇帝的這種作法，一方面順從太后所請，但另一方面也同時在防範小人居中興風作浪。由此可見乾隆皇帝的精明幹練：他侍太后至孝，對她生活上的大小事都加過問，但同時又善於防微杜漸。¹²⁸

七、家事國事

雖然太后的地位尊貴，但她的職權只限於後宮之內。不過太后對於自己的地位與權力有時也具有相當程度的自覺，而會以迂迴的方式，建議乾隆皇帝加以配合。只不過她的要求都具有善意且考慮周詳。這類事實至少有三例，影響層面大至家國大事，小到個人的行為方式。如下所述。第一個例子是：太后對於乾隆皇帝兩度面臨擇立新后的問題時，都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根據清朝禮制，太后的權責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冊立皇后的儀式。¹²⁹ 換言之，太后有權參與皇帝決定立哪一個女子為后。而在這一點上，她的確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兩度影響到乾隆皇帝續立皇后的人選。第一次發生在乾隆十五年（1750）。原來乾隆皇帝的首任皇后為富察氏（孝賢皇后，圖 5）；他是他在皇子時期的福晉。富察氏柔美溫婉，生活節儉，侍太后極孝；帝后兩人極為恩愛。她曾生下皇二子永璉（1731-1738），和皇七子永琮（1746-1747）。乾隆皇帝有意立嫡，因此曾先後密立他們為嗣君；可惜二人都早逝：永璉逝世於乾隆三年（1738），年僅八歲；永琮出生後第二年便逝世，年紀不滿兩歲。更不幸的是，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富察氏在隨乾隆皇帝和太

126 慧賢皇貴妃小傳，見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下，頁 21b-22a；傳恆小傳，見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冊 35，卷 88，頁 10445-10451；福康安小傳，見同書，冊 36，卷 117，頁 10917-10924；高斌小傳，見同書，冊 35，卷 97，頁 10629-10634；高晉為慧賢皇貴妃的堂兄弟；高恆則為她的親弟弟；二人小傳，見同書，冊 35，卷 97，頁 10634-10636。

127（清）于敏中等，《國朝宮史》，卷 4，頁 8-10，〈訓諭四〉，「乾隆元年七月十五日」條。

128（清）于敏中等，《國朝宮史》，卷 4，頁 11-12，「乾隆三年正月初三日」條。

129（清）于敏中等，《國朝宮史》，卷 5，頁 26-37〈典禮一·禮儀〉，「冊立皇后儀」條。

后東巡山東的回程途中，突然病歿於濟南。乾隆皇帝為此哀痛逾常，因此並未馬上再立新后。乾隆十五年（1750），當他四十歲時，在太后的建議下，只好將當時的嬪貴妃烏拉納喇氏（1718-1766）立為新的皇后。¹³⁰ 後者也為他生下二男一女（皇十二子永璉、皇十三子永璟、和皇五女）；但乾隆皇帝和這位繼后之間的感情並不融洽。

乾隆三十年（1762），乾隆皇帝奉太后第四次南巡，繼后和其他一些嬪妃也同行。當舟至杭州時，繼后與皇帝因故爭吵；繼后隨即斷髮以示抗議。斷髮為滿洲人的守喪習俗；繼后以此犯下大忌。乾隆皇帝震怒之下，立刻命人將她護送回京，從此不予理會。乾隆三十一（1766）年七月，繼后病逝。乾隆皇帝當時在避暑山莊，知道消息後，不但不哀痛，反而再加以斥責，並命人將她降格，以皇貴妃之禮發喪，也未給予諡號。他的怒氣延及她所生的兒女；他們無一受寵。¹³¹

換言之，此時，乾隆皇帝再度面臨擇立新后的問題，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此之後，乾隆皇帝不再立后。他只是將她最喜愛的令妃（魏佳氏，1727-1775，圖18）晉升為令貴妃，統攝六宮之事。令妃為正黃旗包衣管領下人清泰之女；她在乾隆十年（1745）左右進宮後，便極受乾隆皇帝鍾愛，很快由貴人晉升為嬪，後又晉為妃。乾隆三十年（1765），烏拉納喇氏失寵後，她便晉為貴妃，後來又升為皇貴妃。第二年繼后過世，但令皇貴妃卻一直未被立為皇后。令皇貴妃曾生四男二女；男子之中僅皇十五子永（顥）琰（1760-1820），和皇十七子永璘（1766-1820）存活。她在乾隆四十年（1776）逝世，享年四十九歲。¹³² 乾隆皇帝為此十分傷悲，特別作〈令懿皇貴妃輓詩〉。¹³³ 其實，在她逝世前兩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1774）時，乾隆皇帝已經密立皇十五子永（顥）琰為嗣君，¹³⁴ 但他都不動聲色，而要等到二十一年後，也就是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時，才正式宣佈這項消息。次年永琰即皇帝位，改名為顥琰，年號「嘉慶」（1796-1820）。¹³⁵ 那時令皇貴

130 烏拉納喇氏；見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下，頁14b-18b。

131 關於乾隆皇帝與富察氏和烏拉納喇氏的婚姻生活，詳見陳葆真〈《心窩寫平》——乾隆皇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集刊》，21期（2006），頁89-150。

132 關於令妃的小傳，見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下，頁18b-21b。

133（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7，頁705），卷26，頁29-30。

134（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7，頁525），卷16，頁30，〈長至前一日謁壇禮畢宿齋宮即事成什〉。那時永琰十四歲。

135 關於乾隆皇帝傳位於嘉慶皇帝事，見（清）清高宗，《御製文三集》（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1，頁607-610），卷6，頁6-8，〈紀元周甲建立皇太子以明年元旦授寶為嘉慶元年詔〉；又見《御製文四集》（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1，頁686-687），卷1，頁1-3，〈丙辰元日傳位於皇帝並卻上尊號詔〉。

妃母以子貴，才被追諡為「孝儀皇后」。

雖然，在事實上令妃可說是繼孝賢皇后之後，乾隆皇帝生平當中最珍愛的伴侶，但是他為何在烏拉納喇氏過世後，只肯讓她以皇貴妃之名統攝六宮，長達十年（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1766-1776）之久，讓她長期握有實權而卻不給榮銜？乾隆皇帝為何一直要等到她已經過世二十年之後，才因為她所生的皇十五子即位為皇帝的關係而追諡她為「孝儀皇后」？史家很少去質疑這其中的緣由。個人推測乾隆皇帝之所以如此作為，應曾經與太后商議過；而他們的理由可能有兩個，略述如下。

第一個原因，也是比較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和令妃的家世有關。令妃為滿洲正黃旗包衣管領下人清泰之女。包衣為滿洲入關前，在遼東爭戰勝利中所俘的漢人；他們的地位低下，有如世僕，但在編制上也和他們所屬的滿洲主人歸屬同一旗籍，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如曹寅（曹雪芹祖父）一家。¹³⁶ 令妃雖然在編制上也屬於內務府上三旗，得以參予選秀入宮，後來得寵，步步高升，成為皇貴妃。但她畢竟是漢裔，而且出身低下。因此，要立她為后，在當時的情況之下，是件十分困難的事。因為滿洲社會重視階級，婚嫁更是如此；而那時的滿洲世族最有勢力的如瓜爾佳氏、鈕祜錄氏、和伊爾根覺羅氏、和馬佳氏等八大家：「凡尚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奴僕皆以八族為最」。¹³⁷ 更何況清朝入關之後，十分重視滿、漢之別：在全國各地，滿、漢都分區居住，互不通婚。就是皇室選秀女，也僅限於全國八旗及齡（十三歲）少女；漢女不得參予。雖有文獻記載：順治皇帝（1638 生；1644-1661 在位）時「戶部侍郎石申之女，以漢籍入選，賜居永壽宮」，為庶妃。¹³⁸ 但這是特例。一般來說，漢女不得入宮；而且宮中也不得穿漢服。¹³⁹ 簡言之，當時滿人自居統治者，漢人則是被征服的被統治者；滿漢不通婚是為了保統治者的血統純正。雖然包衣也算是旗人的身分，但如果要立一個有漢人血統的包衣之女為皇后，權位都在滿洲宗室和貴族之上，那無論如何是無法令滿人接受的事。因此，個人覺得，乾隆皇帝和太后應該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所以先前當孝賢皇后過世之後，太后才會

136 參見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著，陳引馳、郭茜、趙穎之、丁旻合譯，《曹寅與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

137 詳見（清）昭槤（汲修主人），《嘯亭雜錄》，卷 8，頁 17b-18a，〈八大家〉條。

138 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上，頁 77a。

139 至於現今傳世的雍正和乾隆二帝的一些「漢裝行樂圖」，事實上應是虛構的。甚至，在雍正和乾隆時期所繪製的《十二月令圖》中所見一些後宮女子在圓明園中的活動，她們著漢服的真實性也都令人存疑。詳見陳葆真，〈雍正與乾隆二帝漢裝行樂圖的虛實與意涵〉，《故宮學術季刊》，27 卷 3 期（2010 春），頁 49-102。

強烈建議乾隆皇帝立滿人的嫺妃烏拉納喇氏為繼后；雖然當時乾隆皇帝並不樂意，因為他深深地懷念著孝賢皇后。¹⁴⁰ 而且，因為那時他最寵愛的女子是令妃，而非烏拉納喇氏。但為了以上的原因，他只好勉強接受太后的建議。不過這個勉強的決定，結果導致後來帝后失和，繼后失寵。而在乾隆三十一年，繼后過世之後，中宮再度缺位；但是，那時乾隆皇帝可能還是基於以上的原因，而一直不肯立令皇貴妃為皇后。一直要等到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他宣佈令皇貴妃的兒子永琰為嗣君時，母以子貴，她才有資格自然而然地被追諡為孝儀皇后。不過，那時令皇貴妃已經逝世整整二十年了；諡號只是死後尊銜，不具實質意義。然而，也唯有在那種情況下，採取那種方式，才能勉強令滿人接受令妃的身分與地位。簡言之，令妃生前雖然深受寵愛，但卻一直未被立為皇后的關鍵原因，應是她的漢裔血統和她出身包衣的關係。

第二個理由則與乾隆皇帝一直考慮立嫡子為嗣君的經驗和理想有關。如上所述，乾隆皇帝曾在乾隆元年（1736）時密立孝賢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璉（1731-1738）為嗣君。但可惜，永璉在乾隆三年（1738），年僅八歲便過世。後來，在乾隆十一年（1746），他又密立孝賢皇后所生的皇七子永琮（1746-1747）為嗣君。不幸的是，永琮在次年又早逝，時年才二歲。更不幸的是，再次年，乾隆十三年（1748），連他鍾愛的孝賢皇后也過世了。於是他立嫡希望徹底失敗。¹⁴¹ 因此，當乾隆三十一年（1766），繼后烏拉納喇氏過世之後，如果他馬上立令皇貴妃為新后的話，那麼當時令皇貴妃所生的二個皇子：皇十五子永琰（1760-1820）和皇十七子永璘（1766-1820）便成為嫡子。基於他素來有立嫡的想法，如此一來，那麼他們中的一個便可能成為嗣君。但由於在此之前，他已有二次密立幼年嫡子為嗣君，而最後都失敗的經驗；因此，這次他不再冒然行事。何況那時永琰才六歲，而永璘也才剛出生，兩人都賢愚未辨；為了怕重蹈覆轍，所以他暫時不想急著為他們母子改變身分。可能也是基於這個原因，所以乾隆皇帝在此時才決定不立新后。如此一來，也可以避免立刻面對立嫡與否的問題。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乾隆皇帝是否應該遵守他原訂在位滿六十年後便禪位給嗣君的計畫。那是乾隆皇帝在他剛即位時所立下的誓言；原因是他不敢逾越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的期限。但是後來乾隆皇帝對這個計劃有些悔意；於是

140 參見陳葆真，〈《心寫治平》—乾隆皇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頁 124。

141 參見陳葆真，〈從四幅「歲朝圖」的表現特色談到乾隆皇帝的親子關係〉，《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8 期（2010），頁 123-184。

他便和太后商量。太后認為：只要他一直善盡職責，屆時不必一定非要退位不可。乾隆皇帝因此向上天默禱：如果上天同意太后之言，則令她享百歲之壽，以為明證。但此願未果；太后終於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以八十六高壽過世。乾隆皇帝也因此謹守他原來的誓言，在乾隆六十年後讓位給嗣君。¹⁴² 由以上所述乾隆皇帝如何擇立新后，與決定是否該如期禪位的行為來看，可見太后對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扮演了十分重要而且直接的影響力。皇帝的家事有時也關係到整個國家的政治動態。因此，太后在形式上雖然完全恪守國範家規，未曾直接干政，但實則對乾隆皇帝的某些決策，還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簡言之，她是乾隆皇帝一生中最親近、也是最重要的人。

第三個例子是太后引康熙皇帝侍候孝莊太皇太后（1613-1687）的先例，示意乾隆皇帝要做效他祖父的行為：每次木蘭秋獮，或從他處回來，一定要先到避暑山莊內太后所居之處問安，以示盡孝。¹⁴³ 此事雖小，但卻可見太后個性之精明，而且善引祖宗前例，要求乾隆皇帝做效；而乾隆皇帝也樂於遵守。母子二人互相配合無間，藉此傳為佳話，更顯他的孝行。

小 結

經由以上的觀察，我們可以了解乾隆皇帝對他的生母孝聖皇太后（孝聖憲皇后）的孝行，呈現了前期和後期兩個不同階段的表現；而這些不同的表現，自有它們各異的時空背景和特殊的意義。首先，他在皇子時期與他的生母鈕祜祿氏（熹妃）之間的互動資料幾乎是空白的。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鈕祜祿氏出身不高，在雍邸為格格，身分低下之故。雖然她生下弘曆之後，由於弘曆聰穎過人，倍受雍親王和康熙皇帝鍾愛，因此，她的地位逐漸上升：在雍正皇帝即位之後，先升為熹妃，後晉為熹貴妃；但是她畢竟是側室，因此，名分和地位自然在孝敬憲皇后之下。此時弘曆雖已被密立為嗣君，但尚未公然明示。由於弘曆是庶子，所以各方面都須保持低調。他必需向雍正皇帝和皇母孝敬憲皇后表示忠誠，以確保他的身分和地位，因此也就不能明目張膽地與自己的生母熹妃太親近。基於此，所以縱然此

142 事見（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1，頁392-393），卷93，頁5-6，〈新正雍和宮瞻禮示諸皇子〉；又見卷96，頁3（同書，頁439），〈恭謁泰東陵〉注；《御製詩餘集》，卷4，頁5（同書，頁591），〈恭謁泰東陵〉注。

143 見（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6，頁136-137），卷52，頁15-16；卷68，頁24（同書，頁388），〈木蘭迴蹕至避暑山莊向皇太后安……〉等二詩及注。

時他已能詩文書畫，而且還時常以自己的作品贈送他的皇叔和皇弟，甚至也曾作詩為他的皇母（孝敬憲皇后）祝壽，但都不曾以任何作品贈送給他的生母（熹妃）。

但是，等到雍正九年（1731），他的皇母（孝敬憲皇后）逝世，和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皇帝逝世，他在九月即位之後，這種情形才見逆轉。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底，他馬上尊他的生母熹貴妃為崇慶皇太后，以及其後無止盡的各種孝行。簡言之，乾隆皇帝登基之後，對他的生母孝聖皇太后四十二年來，至親至孝的行為，可謂克盡孝道、無微不至。他除了平日家居時，常向太后問安和侍膳外，每次巡狩都奉太后同行。每當太后壽慶時，又特別送禮祝壽；而每逢太后大壽時，更大事慶祝，包括上徽號、建寺祝壽，並到名山祈福，且命人作畫紀念。四十多年來，他對太后的各種孝行，和太后所享受到的各種尊榮，可謂前所未有的。同時，他對太后的感恩之情，時時在念，並見於他諸多的御製詩中，真可謂念茲在茲，始終如一，至死不渝。他似乎要以這種種行為來證明他是中國歷史上侍母最為盡心，也是最孝順的皇帝。

但為何他要如此大事宣揚他的這些孝行呢？個人認為可能的原因有四：其一，這或許是為了彌補他早期因限於時空環境，以至於不敢對他生母表現出真情的一種過度誇張的行為。其二，此期由於他身為皇帝，再無任何顧忌，因此他的一片孝心真情發自內心而不能自己，不僅形諸於外，又見諸於詩文書畫，可謂天性至孝。其三，他既身為人君，因此有意藉由各種圖畫和文獻，公開顯示他的各種孝行，所謂「百行孝為先」，以此作為萬民表率。其四，他有意藉由史冊，將他的孝行傳之久遠，以證明他是一個恪守祖宗家法，實踐儒家核心價值，以孝治天下的聖主明君，並期望以此在歷史上流芳百世。

〔後記〕本文曾得祝暄惠同學幫忙，建成電子檔，謹此致謝。

引用書目

一、古籍文獻

- (清)于敏中,《國朝宮史》,海口:海南書局,2000。
- (清)阿桂等,《八旬萬壽盛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0-661。
- (清)阿桂等編,《欽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58。
- (清)昭槎,《嘯亭續錄》,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輯7,冊63。
- (清)唐邦志輯,《清皇室四譜》,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資料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
- (清)張爾田,《清列朝后妃傳稿》(1923自序),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輯75,冊742。
- (清)清高宗,《御製詩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2。
- (清)清高宗,《御製詩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4。
- (清)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5-1306。
- (清)清高宗,《御製詩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7-1308。
- (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9-1311。
- (清)清高宗,《御製詩餘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1。
- (清)清高宗,《御製文初集》(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1。
- (清)清高宗,《御製文二集》(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1。
- (清)清高宗,《御製文二集》(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1。
- (清)清高宗,《御製文三集》(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1。
- (清)清高宗,《御製文四集》(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1。
- (清)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0。
- (清)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1977。
- 《清實錄·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慶桂,《國朝宮史續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二、近人論著

- 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著,陳引馳、郭茜、趙穎之、丁旻合譯,《曹寅與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
- 左步青,〈乾隆南巡〉,《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2期,頁22-37。

- 向東，〈孝聖皇太后萬壽慶典時期的五塔寺〉，《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年1期，頁87-92。
- 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
- 汪榮祖，《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 孟亞男，《中國園林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 高王凌，《馬上朝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
- 章唐容輯，《清宮述聞》，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畢梅雪（Michele Pirazzoli）、侯錦郎合著，《木蘭——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莊吉發，《清史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馮明珠編，《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
- 陳觀濤，《話說雍和宮》，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 陳垣，《中西回史日曆》，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 陳葆真，〈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故宮學術季刊》，27卷2期，2009年冬季，頁127-192。
- 陳葆真〈《心寫治平》——乾隆皇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集刊》，21期，2006年，頁89-150。
- 陳葆真，〈雍正與乾隆二帝漢裝行樂圖的虛實與意涵〉，《故宮學術季刊》，27卷3期，2010年春季，頁49-102。
- 陳葆真，〈從四幅「歲朝圖」的表現特色談到乾隆皇帝的親子關係〉，《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8期，2010年，頁123-184。
- 陳葆真，〈康熙皇帝《萬壽圖》與乾隆皇帝《八旬萬壽圖》的比較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0卷3期，2013年春季，頁45-122。
- 聶崇正、楊新，〈《康熙南巡圖》的繪製〉，《紫禁城》，1980年4期，頁16-17。
- 聶崇正，〈四卷白描稿本內容的探討〉，華辰2006年秋季拍賣會，《中國書畫》目錄，北京：華辰拍賣公司，2006。
- 羅文華，《龍袍與袈裟》，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 蘇妙齡，〈乾隆朝《萬國來朝圖》研究〉，《史物論壇》，2007年4期，頁61-103。
- Crowel, Wim. *De Verboden Stad: Hofcultuur von de Chinese Keizers (1644-1911)*, (The Forbidden City: Cour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1644-1911)) Amsterdam: Nauta Dutilh, 1990.
- Hearn, Maxwell. "Document and Portrait: the Southern Tour Painting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in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edited by Ju-hsi Chou and Claudia Brown (Phoenix: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91-131.

Hearn, Maxwell. "The Kangxi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 A Narrative Program by Wang Hui,"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0.

Lo, Hui-Chi. "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Religious Transcendence: The Yongzheng Emperor's
(1678-1735) Deployment of Portraiture,"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9.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mperor Qianlong's Filial Piety to His Mother, Empress Dowager Xiaosheng

Chen Pao-ch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Emperor Qianlong (1711-1799; r. 1736-1795) is noted for his extremely filial piety to his mother, Empress Dowager Xsiasheng 孝聖皇太后 (1692-1777). It is noticeable, however, that he conducted his filial behavior differently in two different stages, based on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the early stage, when he was a prince (1711-1735), he hardly showed his personal feeling toward her; while in the later stage, after he had become the emperor (1736-1795), he remained a consistent sensitive caring and loving person to his mother till her death in the age of eighty-six *sui* (1777). This paper based on his poems,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pictorial evidence, observes his filial behavior seen in these two stages and tries to explicit their implications.

Keywords: Emperor Qianlong, Empress Dowager Chongqing, Empress Dowager Xiaosheng



圖1 傅 郎世寧 (1688-1766) 等 乾隆帝朝服像 絹本設色 軸 271×142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人 孝聖憲皇太后朝服像 絹本設色 軸 230.5 x 141.3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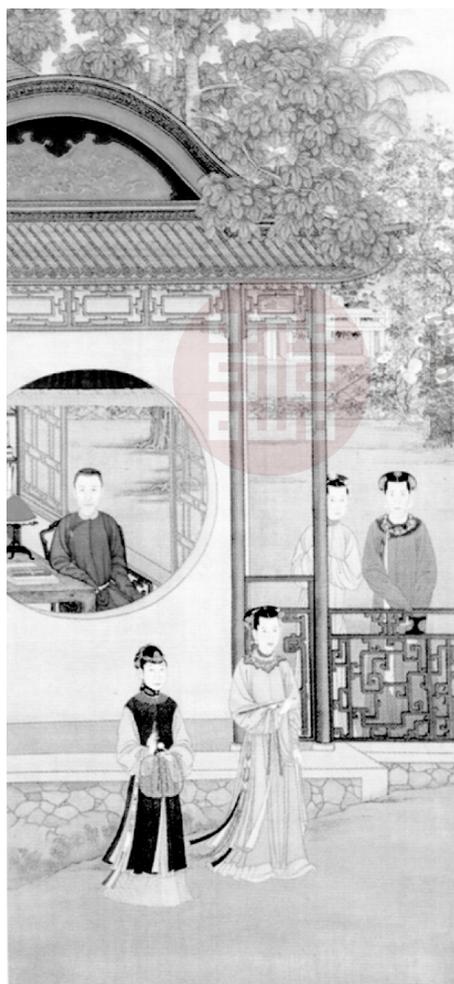


圖3 清人 胤禛讀書圖 絹本設色 軸
157x71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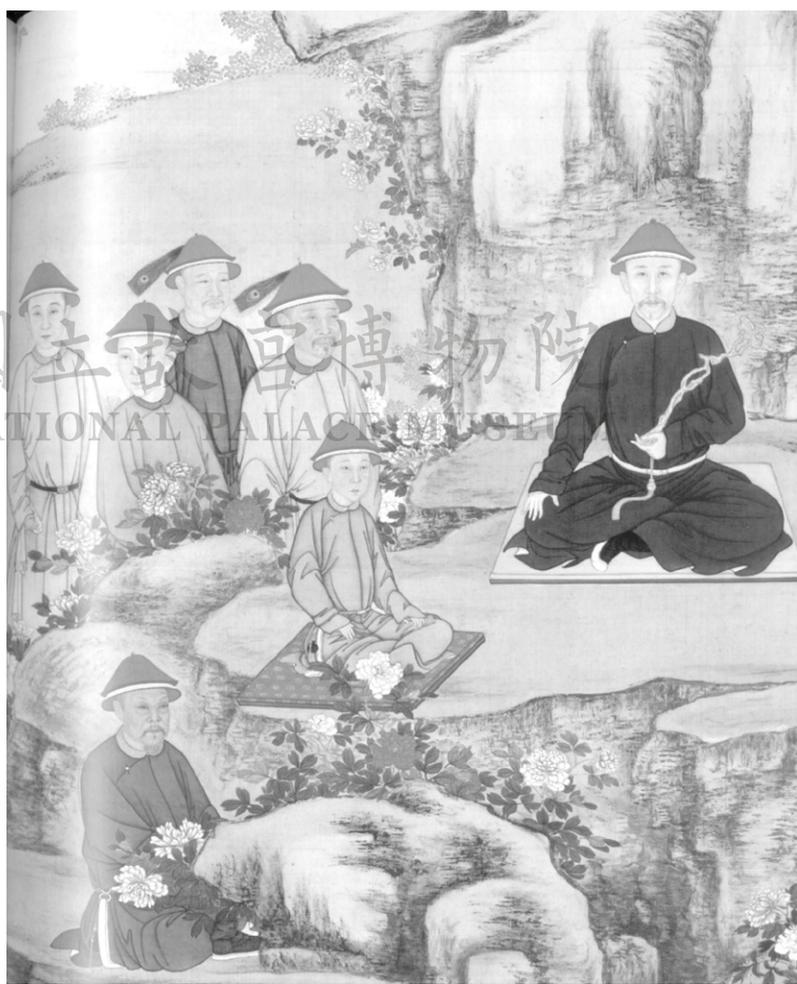


圖4 清人 胤禛賞花圖 局部1722之前 絹本設色 軸 204.1x106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傳 郎世寧等 孝賢純皇后朝服像 約1736-1738 絹本設色 軸 194.8x116.2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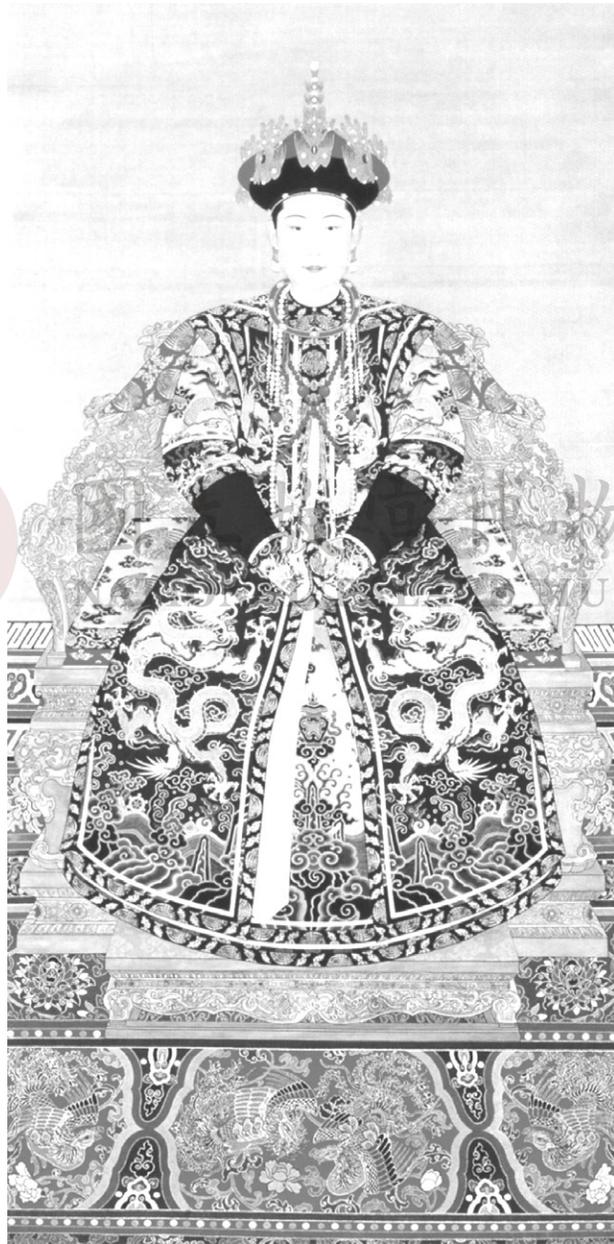


圖6 清人 孝敬憲皇后朝服像 絹本設色 軸
255x117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7 郎世寧、金昆、丁觀鵬、程志道、李慧林 乾隆皇帝秋獮圖 局部 絹本設色
卷 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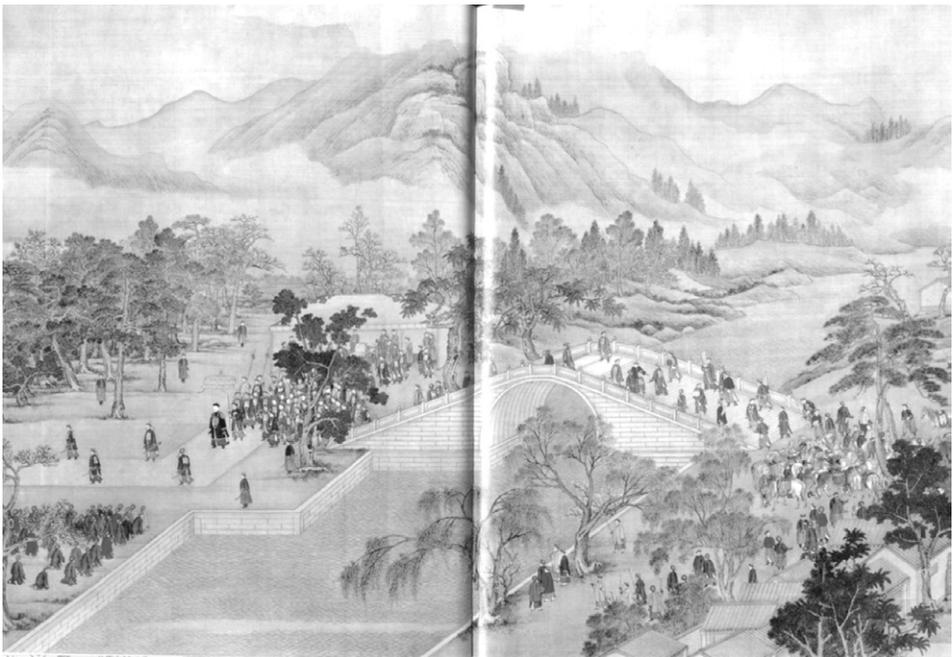


圖8 徐揚 乾隆南巡圖（禹廟） 局部 1776 絹本設色 卷 68.9x1050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9 徐揚 盛世滋生圖 局部 1759 絹本設色 卷
36×1000公分 遼寧省博物館藏

博物院
MUSEUM



圖10 清人 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南巡經由直隸道路圖說 局部 直隸總督周元理奏摺錄副附圖 319×21.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大報恩延壽寺 北京海澱區頤和園萬壽山前山 始建於清乾隆十五年(1750)



圖12 五塔寺 北京海澱區西直門外 始建於明成化九年(1473)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 重修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13 張廷彥 崇慶皇太后萬壽圖 局部 1761 絹本設色 卷 65x1020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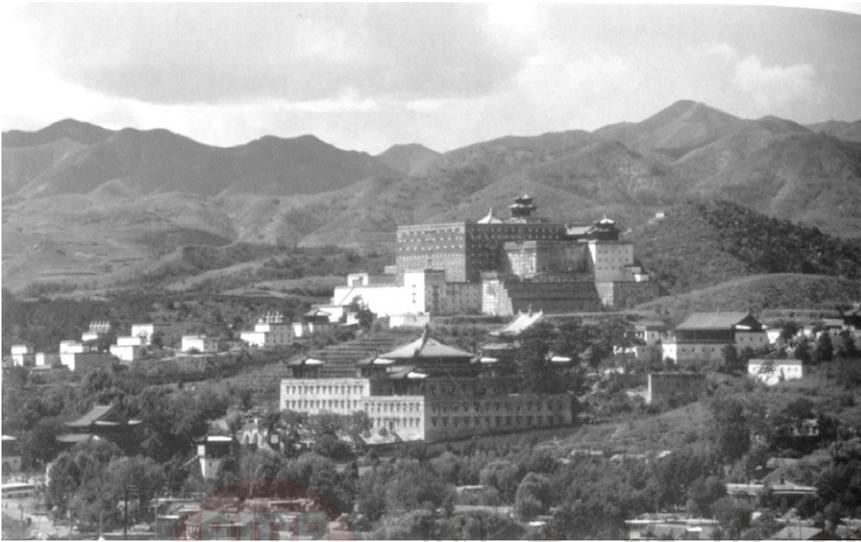


圖14 普陀宗乘之廟 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莊附近 始建於清乾隆三十二年 (1767) 竣工於乾隆三十六年 (1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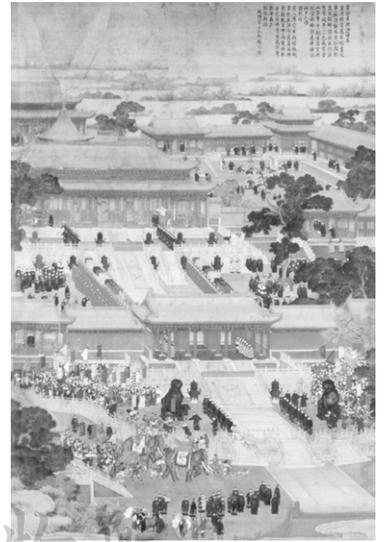


圖15 清人 萬國來朝圖 局部 絹本設色 軸 322×210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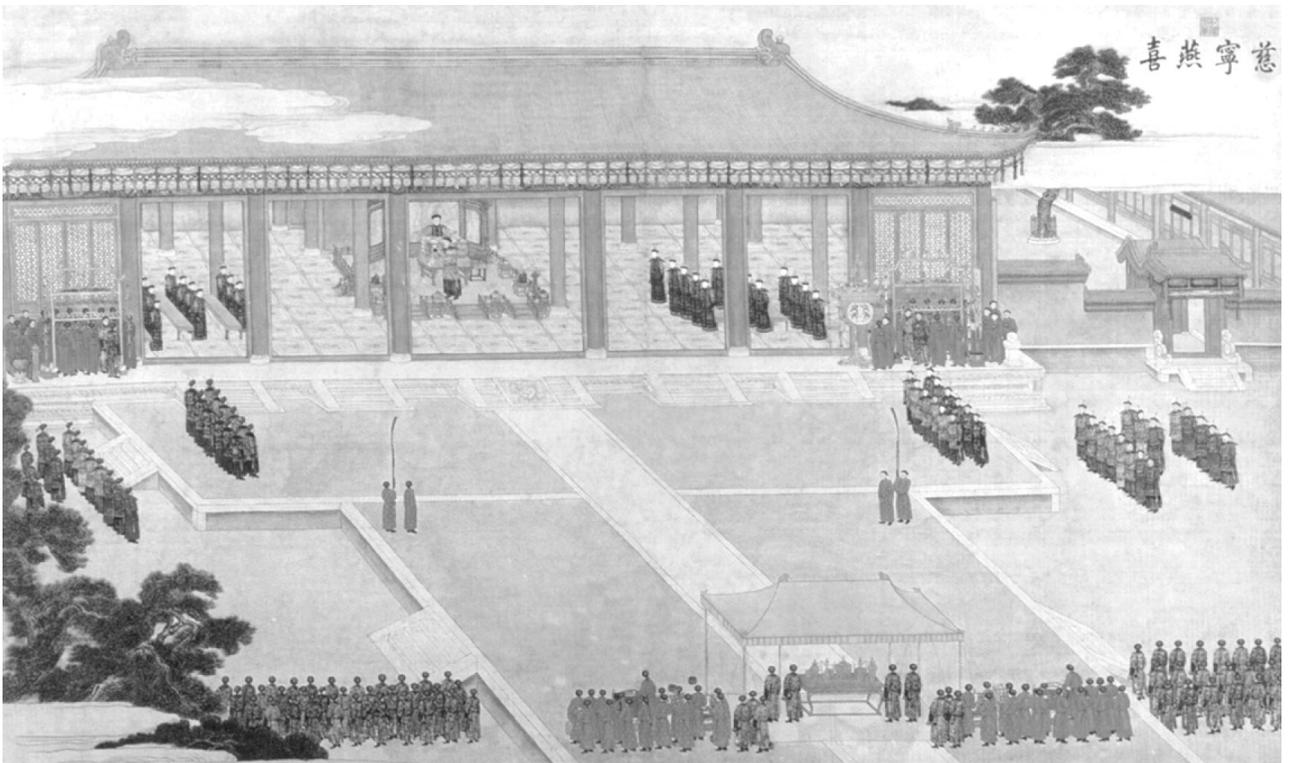


圖16 清人 臚歡蒼景圖冊·慈寧燕喜圖 絹本設色 冊頁 97.5×161.2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孝聖皇太后 綠度母貼綉像 北京雍和宮藏



圖18 傳郎世寧等 令妃吉服像 約1761-1765 〈心寫治平〉
局部 絹本設色 卷 52.9 x 688.3公分 美國克利夫蘭博
物館藏